

发扬路易·艾黎精神，共创中新美好未来

王小龙

今天我们相聚于此，共同缅怀路易·艾黎。他在中国家喻户晓、深受爱戴，是中国老百姓评选出的十大国际友人之一。他在华工作六十载，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同甘共苦，为中国的革命与建设、深化中新友好作出了卓越贡献。今年是中新建交50周年，也是路易·艾黎诞辰125周年。艾黎给中新两国都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在新时代继续弘扬和传承，在艾黎精神的鼓舞下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我到新西兰履新以来，读了一些关于艾黎的书籍，各界友人也跟我分享了很多艾老的故事。愈了解艾黎，我就愈发被他的智慧、勇气和坚毅，尤其是他的为人与大爱，所感动。

95年前，艾黎来到风雨飘摇、动荡黑暗的中国。彼时的神州大地上，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的革命还处在早期艰难摸索中。艾黎当时虽在上海享受着较为优渥的生活条件，但他始终心系中国的劳苦大众，亲自了解并同情他们的苦难。他在消防队长和工厂督查的岗位上始终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他甚至多次利用个人假期赴绥远、江淮、湖北等地志愿参与赈灾救灾工作。在亲眼目睹了中国底层百姓遭受欺压和剥削的悲惨境遇后，艾黎毅然投身中国人民变革社会的斗争中，决心为建立全新的中国贡献一己之力。

抗日战争爆发后，艾黎同斯诺夫妇一道发起了“工合”运动，组织号召失业工人、难民和贫农建立工业生产合作社，生产救亡，解决生活困难，支援抗日战争。他们先后在全国各地成立了3000多个工业合作社，帮助30多万人实现就业，为抗日前线提供了大量人员与物资支持。当时，为了发动各地群众，艾黎走遍了中国的非敌占区，行程达3万公里，这相当于在新西兰从南到北走上10个来回。

1942年以后，艾黎将重心转移到了创办培黎工艺学校上。培黎，意为“为黎明而培训”，艾黎希望为中国革命培养急需的技术人才。他克服种种困难，广泛招收当地农民子弟，启发他们善于分析、勇于创新，学校一度发展到近600人的规模，设有近20个供学生实习的生产组，约30个外教，还建了一所贫困农民可以免费就医的小型医院。师生们从零开始，自己灌溉、采煤、冶炼、制陶、纺织，制造各种生活必需品。可以说，艾黎开创了中国职业教育的先河，为新中国的建设培养了大量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艾黎选择在中国继续他的事业，为世界和平与各国友谊奔波。他积极参加亚太和平会议等各类国际民间会议。同时，他拿起笔杆子，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撰写了大量介绍中国和中国发展的书籍、文章，向世界准确展示一个崭新的中国，其中很多作品都在新西兰出版发行。他还深入研究中国古典和当代诗词，出版了不少广受赞誉的译作，尽心尽力地向西方世界展示绚烂多姿的中华文化。

艾黎的一生是高尚的、无私的，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奉献赢得了中国人民的爱戴，也赢得了世界其他各国人民的尊敬。在他的身上，有几点特质尤为突出：

一是存大爱，始终心系人民。艾黎对中国劳苦大众有着发自内心的牵挂和热爱，将一切都奉献给了人民。在上海担任工厂督查时，他努力帮助深受剥削的工人改善工作和生活环境。在山丹培黎学校担任校长时，他教导孩子们要“多为人民做好事”。他一生未婚，却收养、照顾了不少贫苦百姓和革命者的后代。他与劳动人民在一起时是最幸福的，尽力帮助他们改变命运。他总能看到普通大众身上的闪光点，努力激发他们的信念、主动性和创造力。

二是明大义，始终坚定相信中国人民的选择，毫不动摇支持中国的革命与发展事业。在投身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过程中，艾黎接触到了《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也认识了解了中国共产党。艾黎被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所吸引，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推翻旧制度、建设新中国的希望与潜力，认同并支持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出的发展道路，在历史的各个时期始终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选择，直至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从很多方面来看，艾黎都领先于他所处的时代。他在中国的作为以及对中国的看法，有时也无法被他同时代的人所理解。尽管当时在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着所谓的“政治正确”，艾黎本人也因此受到误解，但他一直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

三是求大同，不遗余力推动世界和平、深化各国友好。艾黎看到了不同文化相融共生的潜力和对世界和平友好的重要意义，致力于促进不同文化间交流互鉴。他通过写作、演讲等方式为新西兰人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户。在他本人的影响和支持下，中新友好协会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后得以建立并蓬勃发展，在两国正式建交之前就成了两国人民开展友好往来的重要平台。有人在谈到艾黎的成就及其影响时说，路易·艾黎的一生是边界的交汇，是东西方的桥梁。鉴于此，艾老用一生给世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对如今的我们更具启示意义。他去世35年后的今天，世界又一次来到了十字路口，我们需要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超越分歧的鸿沟，穿透错误信息和误解的藩篱，打破有时是被人故意垒起的排斥和敌对的高墙，以和平共处、友好合作来实现共同利益。这关系到各国的命运，更关系到全人类共同的未来。

——节选自10月20日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小龙在“中新建交50周年暨纪念路易·艾黎精神研讨会”上的讲话

培黎通讯

2022年第2期(总第39期)

主 办：兰州城市学院
编 刊：路易·艾黎研究中心
鸣 谢：培黎老校友
顾 问：周起秀 聂广涛 王自刚
李建平 刘世仲 王延义
刘铁林 杨作俊

编委会

主 任：许尔忠 曹 洁
副主任：石 虹
编 委：冯 驱 刘国忠 张雷涛
刘晚霞 白晓霞 许立业
董 沼

编辑部

主 编：石 虹
编 辑：董 沼 曾桐铭 焦晓霞
宋 福 郭忠宁

编辑部地址：兰州市安宁区街坊路
11号

邮政编码：730070

电子邮箱：519187952@qq.com

路易·艾黎研究中心网站：

<http://rarc.lzcu.edu.cn>

印 刷：甘报集团印务分公司

内部资料性出版物

准印证号(甘) LK000211



欢迎关注路易·艾黎研究中心官方微信

目 录

卷首语

发扬路易·艾黎精神,共创中新美好未来…………… 王小龙(1)

工作动态

全国友协和新中友好协会共同举办中新民间友好
系列活动启动仪式…………… (4)

路易·艾黎研究中心举办纪念艾黎来华95周年座谈会
暨研究工作推进会…………… (5)

甘肃省职业教育红色文化研学旅行示范基地建设工作
推进会在兰州城市学院举行…………… (7)

实录一帧

加快推进研学基地建设,扎实开展红色研学教育
…………… 张晓东(10)

建设高水平职业教育红色文化研学旅行示范基地
…………… 许尔忠(12)

高山仰止

英特纳雄耐尔——记路易·艾黎同志…………… 叶君健(14)

专家特稿

路易·艾黎:一位新西兰人的抗日情缘…………… 聂广涛(25)

国际友人

半个世纪的友谊…………… 马海德(29)

学术交流

为了未来而教育:路易·艾黎与20世纪中国职业教育的转型
…………… 米 靖(32)

史料钩沉

关于艾启赫的四份史料(二)…………… 秦泉安(42)

工合之窗

毛泽东和中国工合运动…………… (49)

抗战时期工合运动中的陕西省工业试验所

…………… 郭巨权 邓宏锁(53)

何克专栏

何克在中国的七年足迹 况 鹰(56)

培黎纪事

我们的艾老 刘庚寅(59)

文物故事

路易·艾黎支援抗美援朝的见证 (61)

照片档案

斯诺的四枚印章 刘力群(62)

封面题字 俞 宏

封面 路易·艾黎和甘肃的孩子们

封二 纪念路易·艾黎诞辰 125 周年

1960 年 10 月毛主席会见斯诺时,为他在《毛泽东选集》(英文版)上签名留念。右一为马海德,右二为路易·艾黎。(图 1)

1977 年 12 月 2 日对外友协在人民大会堂为艾黎 80 寿辰举行宴会,邓小平向艾黎祝酒。(图 2)

1982 年,艾黎同志接受焦若愚市长(右一)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他北京市荣誉公民的称号。中间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图 3)

1985 年甘肃省人民政府授予艾黎甘肃省荣誉公民称号。(图 4)

1987 年甘肃省副省长刘恕向艾黎赠送在甘肃出版的《艾黎自传》中文版。(图 5)

1987 年国庆节,艾黎从医院来到天安门广场,最后一次同北京市民共度节日。(图 6)

1987 年 10 月 28 日,甘肃兰州举行培黎广场暨艾黎和中国孩子雕塑落成大会。(图 7)

2019 年 8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山丹艾黎故居(图 8)

封三 艾黎的红色足迹

红色电波从这里发出(图 1)

1938 年在瑞金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图 2)

为中国抗战争取国际援助(图 3)

舍生忘死奔驰在支援中国抗战的国际运输线上(图 4)

把山丹培黎学校完好交到人民手中(图 5)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图 6)

封底 油画《上海路易·艾黎故居》(作者:金国明)

国家主席习近平 11 月 5 日同新西兰总理阿德恩通电话。习近平强调,中新双方共同努力,跨越政治、历史、文化差异,两国合作创造了多项“第一”。明年是中新建交 50 周年。双方应该总结成功经验,加强战略沟通,“不畏浮云遮望眼”,坚持开放包容、求同存异,深化务实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继续健康稳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双方应该发挥互补优势,扩大经贸合作,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欢迎新方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愿同新方拓展疫苗研发、环境保护、清洁能源、食品安全、科技教育等领域合作,让两国人民有更多获得感。双方要发扬“路易·艾黎精神”,鼓励青年人加强交流,增进两国人民了解和友谊。双方应该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摘自新华社 2021 年 11 月 5 日电《习近平同新西兰总理阿德恩通电话》

全国友协和新中友协共同 举办中新民间友好系列活动启动仪式

3月29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以“传承艾黎精神,共同谱写中新人民友谊新篇章”为主题,通过视频会议形式,共同启动中新民间友好系列活动,纪念中国新西兰建交50周年和中新友谊杰出代表路易·艾黎来华95周年。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姜江、新中友协主席荣大伟在线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小龙和新西兰驻华大使傅恩莱发表视频贺词。全国对外友协美大部主任沈昕、新中友协惠灵顿分会会长黎开盛共同主持会议。

姜江表示,自建交以来,中新两国超越政治、历史、文化差异,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两国关系长期走在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前列。中新关系取得历史性成就,离不开两国各界人士长期以来的辛勤耕耘和精心呵护。其中,最为人知的当属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新人民友谊架桥人路易·艾黎先生。我们永远怀念艾黎,并将把他所体现的国际主义精神传承下去。

姜江表示,友好城市交流合作是推动国家关系的重要力量。自1981年至今,中新已建立42对友好城市关系,为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与友谊、深化地方交往与务实合作、夯实中新友好民意基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愿同新方共同努力,推动友城关系高质量发展,为两国总体关系发展贡献力量。

荣大伟表示,疫情阻碍了人与人的交往,却没有切断中新人民的友好情谊。新中友协将始终以艾黎精神为指引,致力于促进两国

人民的友谊和理解。

王小龙说,举办系列活动是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深化双边关系的重要举措。只要我们坚持相互尊重、开放包容、求同存异、互利共赢,秉持增进人民福祉的共同愿景,就能更好抓住机遇,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继续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傅恩莱表示,正如阿德恩总理所说,中新关系是我们最重要的关系之一,新西兰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努力和精力。系列活动的举办将成为中新庆祝和加强两国关系的重要机会,感谢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讲述路易·艾黎故事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

厦门市副市长庄荣良与惠灵顿市市长安迪·福斯特,甘肃省友协会长张宝军与克莱斯特彻奇市代表、新中友协秘书长大卫·亚当森分别介绍了双方友城交流合作的情况。路易·艾黎研究中心主任石虹和艾黎侄子莫里斯·艾黎分享了弘扬艾黎精神的实践和想法。大家一致认为,中新友好深入人心,两国地方务实合作和民间友好交流大有可为;表示将继续发扬艾黎精神,为夯实中新关系民意基础发挥更大作用。

江苏省、福建省、江西省、湖北省、陕西省和甘肃省等十余个省市友协代表,我驻新使馆、驻克赖斯特彻奇总领馆,新中友协惠灵顿、奥克兰、克赖斯特彻奇和汉密尔顿分会等十余个分会代表共百余人出席了当日活动。

(稿件来源自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微信公众号2022.3.29)

路易·艾黎研究中心召开 纪念艾黎来华95周年视频座谈会

4月21日,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路易·艾黎来华95周年的特殊日子。路易·艾黎研究中心以“弘扬艾黎精神,推进研究工作”为主题,召开纪念路易·艾黎来华95周年座谈会,以深切缅怀这位将毕生献给中国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事业的新西兰友人。中心负责人及13位获批立项的2021年中心研究课题负责人参加了视频会议。

路易·艾黎研究中心主任石虹首先回顾了中心工作的开展情况及取得的成绩。路易·艾黎研究中心自2015年成立以来,自觉地肩负起发掘整理路易·艾黎文化遗存、研究践行路易·艾黎教育思想、传承发扬路易·艾黎精神的使命和责任,通过卓有成效的开展工作和举办各种有影响力的活动,切实为增强我省对外宣传、交流合作的影响力,推动我省职业教育改革作出应有的贡献。

关于研究中心2022年的工作要点。石虹表示,要进一步发挥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服务社会、国际交流等职能,传承红色基因,讲好中国故事、讲好艾黎与中国故事,为弘扬艾黎精神、增进中新友好交流继续努力。

在实践活动方面,以入选“首批甘肃省红色基因传承示范校”和“首批甘肃省职业教育红色文化研学旅行示范基地”为契机,与山丹联合开展研学教材编写工作,加强基地建设,开展职业教育红色文化研学旅行活动。在文

化传承方面,举办“我心中的路易·艾黎”——原创文化作品征集活动。面向中国和新西兰的学生征集包括文学艺术、动漫视频、手工文创等各类文化作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继续开展中新青年的文化寻访等交流活动。在科学研究方面,通过研究项目和课题,深入挖掘路易·艾黎精神丰富内涵,努力增强艾黎研究的校本性、相关性和针对性。积极申报省级及以上研究课题,主要有:“中国与新西兰友好关系发展史研究”申请2022年度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艾黎精神’思政课程主题实践活动”申报2022年甘肃省教育厅“红色基因传承行动”教育活动优秀成果;“路易·艾黎与甘肃中新文化交流简史研究”申报2023年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通过研究课题和项目的申报,凝聚科研力量,锻炼研究队伍,提升研究能力

课题负责人就各自的研究进展情况进行了汇报和说明。一致认为,我校的前身之一是路易·艾黎于1942年创办的培黎学校,80年来,始终肩负“为中国黎明而培训”的崇高使命,秉承“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校训,栉风沐雨,砥砺前行,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征程上铸就了光荣的办学历史。以艾黎精神为核心的培黎文化,是我校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需要精心培育和打造的办学特色和品牌。在课题研究过程中,要紧密结合课程思政建

设,深入挖掘校史中的红色资源,注重资料积累,强化实践应用,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要努力增强研究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把课题成果深度植入课堂教学、实践能力培养、毕业论文指导等环节,提高研究质量;要充分发挥研究育人的功能,通过红色校本课程开发、艾黎精神进课堂、沉浸式教学等实现课题目标的达成度。

(上接13页)兰州城市学院培黎石油工程学院青年教师安会明参加过中新交流项目,沿着路易·艾黎的人生足迹寻访学习。安会明说,通过深入学习,她更能体会路易·艾黎老校长是值得中国人尊重的国际友人,他的教育理念非常先进,作为一名老师她将坚持“手脑并用 创造分析”来引领课堂,激发同学们的创新思维,从而调动学生手脑并用的热情。

走进兰州城市学院艺术设计学院陶瓷工作室,由同学们烧制的陶瓷作品陈列在中央位置。让同学们“手脑并用”也是艺术设计学院的选择。兰州城市学院艺术设计学院院长姚屹东认为,艺术学子也需要手脑并用,才能创造分析。艺术是一门需要灵感的学科,而动手动脑才会更好的激发灵感。对于学生来说,艺术来自生活,也服务于生活,将来同学们走上工作岗位动手能力强,创新思维好才能赢得未来,所以他们在美育教育中依然遵循“路易·艾黎”老校长的教育理念,培养艺术设计人才。现在,兰州城市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开设了工艺美术班,让艺术学子走进工艺美术课堂,勤动手,磨炼耐心,修炼品格,成为一名创新能力强的艺术工作者。兰州城市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大二学子武瑞兰说,他们的艺术课堂上,老师往往会引导大家进行创作,让大家说出自己的见解和想法,有很多艺术设计都是他们负责实施,所以像使用缝纫机他们也得得心应手。

穿越岁月的时空,路易·艾黎的精神已经在兰州城市学院扎根。为了更好地弘扬路易·艾黎精神,传承路易·艾黎理想,2015年12月12日,甘肃省文化提升行动协调推进领导小组批准成立路易·艾黎研究中心,以兰州城市学院为依托,从事路易·艾黎生平、教育思想及工合运动的研究。兰州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路易·艾黎研究中心主任石虹是讲解者,也是探寻者。她的讲述从展览馆序厅的一台牛头刨床开启,这台刨床1947年由国际援助运抵山丹培黎工艺学校,用于教学操作。1953年山丹培黎学校搬迁更名兰州培黎石油学校,刨床又一次随迁兰州供同学们实习使用,直到最近几年才光荣退休,成为展览馆的宝贝。从一个刨床,到

路易·艾黎研究中心2021年研究课题的征集和遴选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艾黎精神”为主题,经全校申报、学院审核和校外专家组评审等环节,共有13个课题予以立项。本次座谈会也是一次课题研究中期检查推进会。

(稿件来源自路易·艾黎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2022.4.22)

一次西迁,从山丹四坝,到黄河之滨,路易·艾黎在甘肃留下了深厚的印记,人民仰望他的精神,期望得到智慧启迪。石虹说,路易·艾黎先生的精神可以概括为热爱和平,追求正义的国际主义精神。艰苦奋斗,“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精神。“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教育实践精神,以及心系人民,无私奉献的博爱精神。艾黎先生的境界让人高山仰止,值得永远去学习挖掘,收获善良与智慧。

兰州城市学院党委书记许尔忠在接受中国甘肃网采访时表示,作为路易·艾黎先生教育事业的继承者,兰州城市学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视察山丹培黎学校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挖掘校史红色资源,不断强化顶层设计,熔铸培黎品牌、打造城市特色,以特色化战略谋求学校高质量发展。他说,兰州城市学院借助入选首批“甘肃省红色基因传承示范校”为契机,大力实施红色文化铸魂育人工程,建好研究中心,用好培黎展馆,编好培黎通讯,开好艾黎金课,办好艾黎特色活动,以打造“五个一”为载体,全方位、多角度为广大师生讲好艾黎故事,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他表示,兰州城市学院将继承优良传统,弘扬艾黎精神,聚焦特色优势,创新办学理念,主动融入“一核三带”区域发展格局,积极响应“四强”行动,依托兰州智慧城市研究院,服务兰州城市发展,助力“强省会”战略行动。他表示,兰州城市学院将继续发扬培黎良好工科办学传统,实施“青年合作社干部线上线下混合培养”等项目,助力甘肃“强工业”战略行动和“技能甘肃”建设;践行艾黎育人理念,实施艾黎人才计划,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借助培黎国际影响,推进“丝绸之路·敦煌文化翻译工程”和相关人文交流项目,助力甘肃文化对外传播,拓展国际交流合作渠道,让路易·艾黎的精神永驻甘肃源远流长,成为甘肃对外友好交流的一张靓丽名片。

(稿件来源自中国甘肃网“您好!路易·艾黎”网络主题采访活动2022.7.6,记者:张振宇 宋芳科 程健)

甘肃省职业教育红色文化研学旅行示范基地建设工作推进会在我校召开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落实教育部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整省推进职业教育发展 打造“技能甘肃”的意见》,6月17日上午,甘肃省职业教育红色文化研学旅行示范基地建设工作推进会在兰州城市学院召开。省委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张晓东、兰州城市学院党委书记许尔忠出席会议。省文旅厅、省教育厅有关业务处室的负责同志,首批5个甘肃省职业教育红色文化研学旅行示范基地、5个培育建设基地的负责同志和成员单位代表参加推进会。



张晓东讲话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承红色基因和职业教育,做出了一系列决策部署,甘肃省遴选建设职业教育红色文化研学旅行示范基地是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旨在发掘、打造甘肃职业教育红色文化品牌,促进红色基因融入职业教育,推进甘肃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自首批示范基地成立以来,各基地在做中学、学中做,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基地建设的征程中迈出了坚实一步。

张晓东对下一步推进基地建设提出要求,一是要明确主体主线,要深化对研学旅行教育价值的准确认识,加强对研学旅行的教育意义、目标、主题等的系统思考,确保课程目标明确、主题选择清晰、运行形式规范;二是要健全制度保障,要制定出台相关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与红色研学旅行协同育人的领导机制、管理机制、运行机制、安



会上,张晓东和许尔忠共同为兰州城市学院、培黎职业学院、甘肃省山丹培黎学校、山丹艾黎纪念馆联合基地揭牌。

全保障机制、监督管理机制、经费统筹机制,制定科学有效的研学旅行制度体系和研学方案,探索建立安全责任落实机制,做到层层落实,责任到人;三是要打造精品课程,各基地建设单位要创新思路,按照教育性、实践性、安全性、公益性的原则,以立德树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为根本目的,精心设计研学旅行课程,打造丰富多彩的研学旅行产品,做到立意高远、目的明确、活动丰富、学习有效;四是要注重实践成效,各基地建设单位要推进红色研学旅行与职业教育协同育人,巩固拓展实践成效,探索育人长效机制,将基地打造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试验田,产学研融合发展的新高地,让其真正成为广大青年学生健康成长的助推器、强心针,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发爱国情怀发挥出强有力的作用。



许尔忠在致辞中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兰州城市学院发展的领导、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诚挚感谢。他指出,建设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特色突出的高水平职业教育红色文化研学旅行示范基地,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指示要求,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推进技能强省战略,推动红色文化教育与职业教育研学实践深度结合的重要举措。兰州城市学院、培黎职业学院、甘肃省山丹培黎学校、山丹艾黎纪念馆联合基地的成立,是兰州城市学院思想政治工作和校园文化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

必将成为学校高质量发展的“红色引擎”。许尔忠表示,兰州城市学院将认真落实今天推进会精神,加强与联合建设单位的协同合作,充分发挥路易·艾黎先生教育事业直接继承者的独特资源和文化优势,坚持高站位谋划、高标准建设、高层次融合,科学开发研学课程,精心培育研学线路,着力打造研学品牌,积极探索教育与文旅、产业与行业、课程与思政、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新途径和新模式,用好用活艾黎独特的文化资源,讲好“艾黎与中国共产党、艾黎与新中国、艾黎与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故事,切实将联合基地打造成为学校讲好红色故事、发扬革命传统、厚植爱国情感、培育民族精神、陶冶道德情操的重要阵地和生动课堂。



会上,首批甘肃省职业教育红色文化研学旅行示范基地、培育建设基地的负责同志分别对基地的建设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汇报。兰州大学王学俭教授、西北师范大学孙健教授、兰州外语职业学院何华教授、甘肃兰神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红色研学事业部经理胡蕾及省文旅厅资源规划处廖永清同志等专家学者对基地建设问诊把脉,进行了现场点评,提出了建设性创新性的意见建议。



下午,与会嘉宾实地考察了兰州城市学院培黎展览馆、艺术设计学院、培黎石油工程学院、培黎机械工程学院等研学基地实训场所。



(稿件来源自兰州城市学院网站
2022.6.17 撰稿:宋福 摄影:王若璇)

“您好！路易·艾黎”网络媒体主题采访活动在甘肃山丹县启动

中国甘肃网6月28日讯(记者程健 宋芳科 任磊)6月28日上午,由中共甘肃省委网信办主办,中共张掖市委网信办、中国甘肃网承办,甘肃省对外友好协会、兰州城市学院、山丹县委网信办协办的“您好！路易·艾黎”网络媒体主题采访活动启动仪式在山丹艾黎纪念馆举行。

据了解,路易·艾黎是新西兰著名社会活动家、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长达60年之久,积极援助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创办培黎工艺学校,为中国人民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事业做出突出贡献,受到了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本次主题采访活动,旨在进一步挖掘路易·艾黎在甘肃的红色故事,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讲好路易·艾黎事迹,实地感受艾黎精神、艾黎情怀及其时代价值和人生品格,精谨细腻画好“一带一路”建设的甘肃“工笔画”。

中国甘肃网总编辑张振宇在致辞中表示,路易·艾黎先生作为“一带一路”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者,近代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最早的开拓者,丝绸之路中国“四坝文化”的发

掘发现者,艾黎精神已然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国际文化品牌,同时也是甘肃极具特色的国际文化名片。艾黎文化、艾黎精神早已融入了甘肃文化内涵,深深植根于甘肃人民心中,成为甘肃精神的重要元素和组成部分。弘扬好“路易·艾黎精神”,讲好路易·艾黎故事,既是新闻媒体的职责和使命,也是甘肃对外传播中国好声音,擘画“一带一路”新蓝图,迈向发展新征程的有力助手。张振宇表示,媒体采访团将踏着艾黎的足迹,深入捕捉细节,让新闻报道更鲜活,运用融媒体优势,全方位、多平台、多角度,挖掘弘扬艾黎故事,提升传播效果,“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甘肃声音”,抒写幸福美好新甘肃的华彩乐章。

启动仪式结束后,媒体采访团将走进山丹艾黎纪念馆、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访艾黎故居、培黎职业学院、艾黎与何克陵园、兰州城市学院等地展开深度采访,探访这位国际友人在甘肃的光辉足迹,实地感受艾黎精神、艾黎情怀及其时代价值和人生品格,讲好路易·艾黎故事、弘扬好“路易·艾黎精神”。

(稿件来源自中国甘肃网2022.6.29)

加快推进研学基地建设 扎实开展红色研学教育

张晓东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全省职业教育大会精神,按照教育部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整省推进职业教育发展 打造“技能甘肃”的意见》关于建设职业教育红色文化研学旅行示范基地的要求,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成立了首批甘肃省职业教育红色文化研学旅行示范基地,今天,我们在兰州城市学院召开基地建设推进会,主要目的是听取各基地建设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加快推进研学基地建设,扎实开展研学教育。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关心职业教育和传承红色基因工作,做出了一系列决策部署,为做好职业教育红色文化研学旅行提供了根本遵循。2020年7月,教育部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整省推进职业教育发展打造“技能甘肃”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将甘肃3—5个产学研示范基地认定为国家级职业教育红色文化研学旅行示范基地”的要求。甘肃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刚刚闭幕,全省上下掀起了学习贯彻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的热潮。在尹弘书记作的大会报告中又一次提到,要“发掘历史文化资源,用好鲜活发展素材,推出一批文艺精品力作。建好红色文化教育基地,赓续红色血脉”。我们遴选建设一批甘肃省职业教育红色文化研学旅行示

范基地,就是要发掘、打造甘肃职业教育红色文化品牌,促进红色基因融入职业教育,推进甘肃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申报国家级职业教育红色文化研学旅行示范基地奠定基础。

2021年6月,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下发了《关于成立甘肃省职业教育红色文化研学旅行示范基地的通知》。通过自愿申报、专家评审,最后挂牌成立首批甘肃省职业教育红色文化研学旅行示范基地5个,建设对象5个。建设内容上涵盖“南梁精神”“镍都工业文明”“中医药文化”“八步沙‘六老汉’三代人治沙群体新时代愚公精神”等10个主题,建设单位上包括政府部门、高校、企业等行业的20个建设单位。从基地筹划设计到申报遴选,再到挂牌成立运营建设,一年多来,各基地摸着石头过河,做中学、学中做,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为以后基地建设迈出了坚实一步。

一是要明确主题主线。红色文化研学旅行是以红色文化和旅游资源为主线,以旅行为载体,以红色研学为主旨的实践活动。其作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教育新形态,在挖掘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何通过研学课程、活动等为传承红色文化更好地服务,将红色文化如盐溶于水般与职业教育教学相结合是

基地建设的必答题。各基地建设单位要深化对研学旅行教育价值的准确认识,加强对研究旅行的教育意义、目标、主题等的系统思考,避免出现课程目标不明确,主题选择不清晰,运行形式不规范等问题,使研学旅行活动流于形式,陷入了“游大于学”“只游不学”“重游轻学”的怪圈。

二是要健全制度保障。2021年,我们制定了《甘肃省职业教育红色文化研学旅行示范基地认定管理办法》,今年我们将进一步研究制定《甘肃省职业教育红色文化研学旅行示范基地建设考核管理办法》,各基地建设单位也要相应制定出台了相关管理制度。目前仍然存在职业教育与红色研学旅行协同育人的领导机制、管理机制、运行机制、安全保障机制、监督监管机制、经费统筹机制等都不够完善,对红色研学的考核评价不系统、不科学甚至不重视等问题。研学旅行过程中交通条件、食品安全、旅游消费欺诈等问题依然不容小视。各基地建设单位要从化解现实难题的角度出发,通过优化顶层设计,加强制度保障,制定科学有效的研学旅行制度体系和研学方案,探索建立行之有效的安全责任落实、事故处理、责任界定及纠纷处理机制,实施分级备案制度,做到层层落实,责任到人。

三是要打造精品课程。甘肃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和光荣革命传统的省份,文化旅游资源丰富。但也存在红色文化资源利用率低、保护不足,研学课程和红色文化研学旅行产品单一、教育性、体验性和参与性不强等问题。如何充分利用好甘肃当地的旅游文化资源,深入挖掘背后的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如何在研学课程的开发中融入历史文化、绿色文化、乡村文化,做到文旅融合,设计出形式多样、特色明显、受众

喜欢的精品课程和红色研学旅行产品,是提升基地建设品质的重要一环。各基地建设单位要创新思路,按照教育性、实践性、安全性、公益性的原则,以立德树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为根本目的,精心设计研学旅行课程,打造丰富多彩的研学旅行产品,做到立意高远、目的明确、活动丰富、学习有效。

四是要注重实践成效。红色文化研学旅行是一个知行合一、由知而信、由信而行的持续推进、逐步深化的过程。红色文化研学旅行对传承红色基因,坚定广大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激发爱国热情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各学校要把基地建设与“一校一品传承红色基因行动”结合起来,要注重把研学旅行的成果转化为青少年学生提升综合素质的自觉行动,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但是部分基地对红色文化的认识和挖掘仍然不深,多为走马观花式的红色教育游览,过程缺乏互动性、参与性、故事性和体验性,未能让游览者真正“游起来”,形成系统的、丰富的、深度的红色旅游体验,心得感悟更是无从谈起。各基地建设单位要推进红色研学旅行与职业教育协同育人,巩固拓展实践成效,探索育人长效机制,力争用3-5年时间,建设一批甘肃省职业教育红色文化研学旅行示范基地,将其打造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试验田,产学研融合发展的新高地,让其真正成为广大青年学生健康成长的助推器、强心针,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发爱国情怀发挥出强有力的作用。

(本文是省委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张晓东在在甘肃省职业教育红色文化研学旅行示范基地建设工作推进会上的致辞摘要,题目为编者所加)

建设高水平职业教育 红色文化研学旅行示范基地

许尔忠

一直以来,兰州城市学院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秉承路易·艾黎先生倡导的“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校训精神,扎根甘肃、艰苦创业,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应用型高素质人才,为甘肃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特别是作为路易·艾黎先生教育事业的继承者,学校自觉肩负起发掘整理路易·艾黎文化遗存、研究践行路易·艾黎教育理念、传承发扬路易·艾黎精神的使命和责任,深入挖掘校史中的红色资源,持续推动红色基因传承行动,实施红色文化铸魂育人工程,将路易·艾黎精神作为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和有效载体,作为应用型人才培养和校园文化建设的宝贵资源,不断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汇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学校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握“三新一高”要求,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抢抓机遇,主动作为,改革创新,先试先行,在熔铸培黎品牌上做文章,在打造城市特色上下功夫,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扎根陇原大地,凝心

聚力推进学校城市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为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努力奋斗。

建设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特色突出的高水平职业教育红色文化研学旅行示范基地,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指示要求,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推进技能强省战略,推动红色文化与职业教育研学实践深度结合的重要举措。兰州城市学院、培黎职业学院、甘肃省山丹培黎学校、山丹艾黎纪念馆联合基地被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文旅厅授予首批“甘肃省职业教育红色文化研学旅行示范基地”,这是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和校园文化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必将成为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的“红色引擎”。

我们将认真落实今天推进会精神,加强与联合建设单位培黎职业学院、甘肃省培黎学校、山丹艾黎纪念馆的协同合作,充分发挥路易·艾黎先生教育事业直接继承者的独特资源和文化优势,坚持高站位谋划、高标准建设、高层次融合,科学开发研学课程,精心培育研学线路,着力打造研学品牌,积极探索教育与文旅、产业与行业、课程与思政、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新途径和新模式,用好用活艾黎独特的文化资源,讲好“艾黎与中国共产

党、艾黎与新中国、艾黎与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故事,切实将联合基地打造成为讲好红色故事、弘扬艾黎精神、发扬革命传统、厚植爱国情感、陶冶道德情操的重要阵地和生动课堂。

(本文是兰州城市学院党委书记许尔忠在甘肃省职业教育红色文化研学旅行示范基地建设工作推进会上的致辞摘要,题目为编者所加)

兰州城市学院:弘扬艾黎精神 培养时代新人 服务城市发展

中国甘肃网

6月30日,“您好!路易·艾黎”网络媒体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兰州城市学院,采访兰州城市学院在路易·艾黎精神研究和传承方面做出的努力。

兰州市安宁区培黎广场,有一座路易·艾黎和孩子们在一起的雕塑。雕塑后面有长达百米的浮雕墙,静静讲述路易·艾黎在中国的故事。从陕西双石铺培黎工艺学校发端,到历经千辛万苦长途跋涉迁校张掖山丹,再到迁校兰州成立培黎石油学校。路易·艾黎的办学画卷在黄河之滨徐徐展开。走过培黎广场,经过一段绿树掩映的小巷,就来到了兰州城市学院培黎校区。路易·艾黎、乔治·何克的雕塑依然静静地守望着校园。

1942年,路易·艾黎和乔治·何克等一批有志之士,在陕西双石铺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1945年学校迁往张掖山丹县,后于1953年迁至兰州。2003年培黎石油学校与兰州师专合并,2006年经教育部批准成立兰州城市学院。一路走来,迭经变革。路易·艾黎先生在长期办学实践中形成的“手脑并用、创造分析”教育思想,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2014年兰州城市学院将之确定为校训。

“这个实训室有黑板桌椅,我们的同学在这里可以一边实训一边上课,老校长路易·艾黎的校训一直指引着我们的教学实践。”兰州城市学院培黎机械工程学院院长刘广桥在学院实训中心介绍学院的办学情况,“手脑并用 创造分析”的校训悬挂在最醒目位置。兰州城市学院培黎机械工程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42年,路易·艾黎在陕西双石铺创办的培黎工艺学校,一路走来,培黎工艺学校在校训引导下重视实践创造了很多奇迹,上个世纪40年代张掖山丹通电,也是山丹培黎工艺学

校学生的杰作。刘广桥说,作为应用本科专业,他们将实操作为提升学生动手能力的重要抓手,倡导学生们响应路易·艾黎老校长的号召,不断在实践中成长、创新,成为优秀的实用人才。

事实上,1953年,山丹培黎工艺学校搬迁成立兰州培黎石油学校后,“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教育理念便得到了很好传承,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培黎学子把建设工地当成实训场地,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留下了青春回忆。兰州七里河黄河大桥就有培黎学子参与实训焊接,兰炼、兰化等重点工程建设都有培黎学子的身影。“虽然时代不同,但是我们重视实践的传统不能丢,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坚持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思路,不断提升本科教学水平。”刘广桥如是说。

“放眼世界雄心大,我为祖国献石油。”上个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百废待兴,石油有着工业“粮食”之称,为祖国献石油成为一代人的真挚心愿。搬迁到兰州的兰州培黎石油学校便肩负了这个为新中国培养石油人才的时代重任。几十年过去后,兰州城市学院石油工程学院继承了这份光荣传统,延续着路易·艾黎的教育梦想。“弘扬艾黎精神、弘扬铁人精神、弘扬大国工匠精神”是新时代兰州城市学院石油工程学院的精神谱系。“路易·艾黎老校长提出的校训是‘手脑并用、创造分析’,为了更好地落实老校长的理念,结合石油学子的实际情况,我们又提出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的院训,充分融入了路易·艾黎老校长在艰苦环境下坚韧不拔的办学精神,激励石油学子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艰苦创业,成就梦想。”兰州城市学院培黎石油工程学院院长杨斌说道。

(下转第6页)

英特纳雄耐尔——记路易·艾黎同志

叶君健

编者按：深受广大少年儿童喜爱的著名作家叶君健，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新长征路上，革命青春焕发，用细腻生动的笔触和引人入胜的情节创作了长篇人物故事《英特纳雄耐尔——记路易·艾黎同志》，其目的正如作者本人在《叶君健近作·后记》中所说：“为了给少年儿童提供一点有关国际主义教育的资料”。

这篇作品最初发表在《人民文学》1978年第5期上，后收录在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79年6月出版的《叶君健近作》一书中。从作家的角度专门讲述艾黎故事，这在路易·艾黎研究资料中极为罕见而且弥足珍贵，现予以全文刊载，以飨读者。



1927年4月21日，一艘从香港沿着中国东海岸行驶的英国商船，微微向右掉了一下头，便进入了上海港外的吴淞口，它的速度渐渐慢下来了。这时，一个年近30的年轻人走上了甲板。他中等个子，宽肩阔胸，一双手又粗大又有力，体格像个拳师。这个青年目光炯炯地向四下眺望了一下。他立刻懂得了船的速度为什么要放慢：这里的水面上布满了各色各样的船只——从古老的帆船、木船，到近代的货轮和兵舰，

好像在这里开一个古今中外船舶展览会。看着这一片混乱的上海港,青年人反而松了一口气:终于要到达旅途的目的地了。

他的名字叫路易·艾黎,他是新西兰人,一个普通教师的儿子,他现在就是从新西兰经过香港到这里来的。他的祖先来自爱尔兰,这原是一个小小的农业国家,作为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英国的近邻,它一直是处于一种被压迫的半殖民状态之中。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爱尔兰人民就一直在为反抗英国的压迫和控制而进行斗争——至今也没有停止。路易·艾黎没有接他父亲“事业”的班,倒是继承了他祖先的反抗精神,他的名字就说明问题:“路易”源出于新西兰土著民族麻奥里人的首领路易·曼尼亚波托。上世纪60年代,这位“路易”带领一批起义的麻奥里人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英军司令以将近7倍的步兵和炮兵,包围了他所指挥的武装、在集中对他进行了3天疯狂的炮轰以后,英军司令要求他无条件投降,他回答说:“我们将要永远地战斗下去——永远!永远!”最后他终于冲出了英军的包围圈。他的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深深引起了艾黎的感佩和崇敬。

艾黎是在资本主义开始走下坡路的时期成长起来的。在他快要成年的时候,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瓜分世界市场而产生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已经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人类屠杀——第一次世界大战。当然,当时的艾黎还认识不到这场战争的性质。新西兰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按照统治阶级的宣传,大英帝国的使命是保卫人类的文化、自由、基督精神和一切人间美好的东西,“这次战争是正义与邪恶势力的斗争”,因此大英帝国的臣民有责任参加这次战争。新西兰议会特为此通过了一个征兵法案,规定适龄的

新西兰青年都必须到欧洲战场去服役。在整个战争期间,这个只有100多万人口的岛国,就输送了11万多人,占全国人口将近10%。路易·艾黎也于1917年被输送到法国战场上去了。

他在战场上看到了什么呢?他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水渍的战壕,半截暴露在战壕壁上的士兵尸体……往来于战壕和营房之间的疲劳跋涉……炮弹、狙击手和疾病所造成的人体垃圾堆积如山……”在这样的一个战场上,1.7万多名新西兰青年失踪了,5.8万多人受了伤,占新西兰送往前线去的士兵总数的近80%!这是怎样的一次战争啊?艾黎本人被毒气窒息过一次,两次受到了弹伤。1918年他从战场上退下来时,他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找出一个答案——战争结束后也没有能找出一个答案。伤愈后他决定暂时不再去思索它。他和一个朋友到一个叫做塔拉纳基的荒凉地带去垦荒,在那里开辟一个放羊的牧场。

尽管这个地方荒凉,但他却能在这里得到安静。他朝夕和羊群在一起,炮火声听不见了,战友们成堆的尸体在他的脑海中变得模糊了,他暂时忘记了这个世界,他也希望这个世界忘掉他。这里的景色也把他带进了一个超然的境地。引用他自己的话说,“这里柠檬树像魔术一样地生长……树枝被丰饶的果实压得弯弯……处处是鸟语和花香……当你在雨天爬上山坡的时候羊齿草就温柔地抚摸你的光腿……”。

这样一个境界中,他一口气干了6年的牧羊人活计。但这个世界到底还是没有忘掉他。他赖以生存的羊毛开始提醒他,他仍然是生活在那个矛盾重重的旧世界。羊毛的价钱在市场上从两个先令六便士一磅跌到两个便士一磅。最后,一车羊毛的收入,

甚至连运到收购站的费用都抵不上。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恐慌终于也向他所在的这个荒凉地带袭来了！他不能只靠美丽的天然景色过日子。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啊？它这样发展下去行吗？

当他发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从一张旧报纸中看到一条有关中国的消息：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大革命。新兴的革命力量，正在对旧的势力进行摧枯拉朽式的全面扫荡。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中国在变动，世界也不能不变动，而这个世界也必须变。到中国去！他起了这样一个想法，便也就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但这个消息他确实也得到晚了一点：中国的实际情况已经又有了变化。当他乘坐的那条船进入吴淞口的时候，中国已经看不出他想像中的那种轰轰烈烈的革命气氛。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阴沉的景色。外国的兵舰——英国的、美国的、日本的、法国的，甚至还包括意大利的——横陈在中国的水面上，使这阴沉的景色更加上了一层阴影。他所盼望的上海，在这弥漫的烟雾中，渐渐显露出了它朦胧的轮廓。

“啊，上海！”他低声地对这座在世界被排为第六位的大城市说：“真没有想到，你现在是如此萎靡，像伏在一群虎视眈眈的野兽底下的一个俘虏！”没有多久，他就下了船，跨过英国太古公司的船码头，走上黄浦滩，作为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上海海关大楼，就耸立在他的面前。这是一个典型英国式的建筑。离它不远就是汇丰银行大楼，这是另一个英国式的建筑。它的门口蹲踞着象征英帝国威力的两座铜雕雄狮。艾黎震惊了一下：这简直像是一个英国殖民地总师府衙门！整个气氛是多么咄咄逼人！这时艾黎才意识到，他来到了上海的所谓“公共租界”，但它并不是英

国的殖民地，而是国际帝国主义所共管的一个“公共”殖民地。它位置在中国的领土上！

当他在作这种沉思的时候，一个中国工人正在他面前经过。这个工人一看见他，就在他面前鄙弃地碎了一口唾沫。

“为什么对我这样仇视？”他望着这个工人离去的背影问自己，“我们彼此都不认识，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冤仇呀”。

他很想走上前去，挥动他那拳师般有力的大手，与这个工人进行一番理论。但是他临时制止住了自己，因为他有一颗平易近人、通情达理的心，他想工人对他采取这种态度，一定会有其他的原因。他环顾了一下这个租界上的气氛，他马上就自己得出一个结论：这是因为我的鼻子长得太高、眼珠发蓝，和这块租界上的统治者有同样的面型。在中国人民眼里我是一个帝国主义的象征。

他当时还不知道，就在他下决心要来中国的时候，蒋介石在英美政府的支持下，已经背叛了革命。这个刽子手前不久还在这个城市屠杀了大批的革命者和工人。他猜测得没有错：那个工人对他碎的那口唾沫，确实代表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感情。再经过一番思家，艾黎认识到这是一种可贵的感情，与新西兰麻奥里人的首领路易·曼尼亚波托对英国统治者所表达的那种感情有很多类似之处。路易·艾黎没有失悔；相反，他很庆幸来到了中国。

二

艾黎到达上海的第四天，他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这里的富豪一定不少，因为有许多公馆像宫殿，有花园，还有林荫小道。……但离这些宫殿式的建筑不远却又

出现了蜘蛛网般的贫民窟——这里有95%的人都在咳嗽,都患有肺气管病。……但人们驱使他们劳动,却比我们驱使牛马还厉害。”他决定在这里呆下来,他要看看这个作为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的上海究竟是怎样一个城市。通过一个朋友的介绍,他到作为公共租界行政机构的“工部局”所属的消防队当一名副队长。这要归功于他那副引起中国工人对他唾沫的、作为“帝国主义象征”的面孔——他是一个白种人,但这个职位却容许他以检查消防设备的名义,察看公共租界内一切工厂内部的情况。这些工厂的内部情况,是帝国主义和中外资本家怎样剥削中国劳动人民的一个缩影。这里最好引用艾黎本人在他的一本叫做《有办法》的书中所写下的纪录:

“上海的缫丝厂是我所检查过的最可怕的地方。一行一行的孩子,有的还没有达到八九岁的年龄,每天要在煮着茧子的大铁锅旁站12小时。他们的手指红肿,眼睛发红,眼皮下垂,工头手里拿着八号铁丝作的鞭子在他们后面走来走去,有不少孩子被这些工头打得号叫爹娘。如果一个孩子错拉断了一根茧丝,工头就舀起锅里的开水淋他的手臂作为惩罚。在上海的炎热季节,这些车间的温度是那么高,我在那里呆几分钟就已经支持不了。我一直建议工厂老板改善设备,但他们总是置之不理。比些孩子的工资真是少得可怜……。”

“有一个圣诞节的早晨,我去检查一个青红帮头子开的工厂,车间的地上布满了工人的尸体,他们都是一个退火炉爆炸的牺牲者……但这个厂里的老板娘——一个胖得像母猪的女人——这时却仍在殴打一个正在干活的学徒。我建议她把工厂的设备做点初步的改进,她一听就火冒万丈,骂个

不停……”

“…有一个缫丝厂的楼梯扶手断了,13个孩子被踩死。一个橡胶工厂发生了爆炸,90个女工和童工被炸死……这样的事层出不穷,每天都有。”

这只不过是中国工人在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下一些突然暴死的情况,但每天在积劳成疾中慢慢死亡的人却更是不计其数。

艾黎有一天发现在电池厂的许多学徒,还没有成年,就已经在慢慢地接近死亡。这使他想起,他们身体内一定中了不少铅毒。有一个铬板工厂全是由一群“有病和疲劳的孩子操作,工时是意外地长,工作条件是难以形容地原始”,他相信这些孩子的体内一定含有不少毒物。当时有一个在上海开业的美国医生马海德,是他的朋友。他收集了这些孩子的小便,要求马海德做一次检验。检验的结果,完全证实了他的推想。怎么办?

“这不是单纯医药可以治疗的疾病,”马海德说,“根本的办法是把整个制度做一次彻底的改变!”

当时另一个美国人,《大地的女儿》的作者史沫特莱也在上海。艾黎带她到这些骇人听闻的“血泪车间”后对史沫特莱说,“这样一个局面就无法推翻?”史沫特莱紧紧地握着艾黎的手,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她用坚定的语调说:“那么我们就马上开始为这种改变而工作吧。”就在这期间,艾黎去向他的一位名叫巴林的博士朋友请教,巴林博士送他一本书《资本论》。巴林博士是一个英国人,文质彬彬,似乎脑子在经常思索问题,“博士”这个头衔对他倒似乎很相称。他的社会职业是在上海一个美国人办的英文报纸《大美晚报》当编辑,这个报纸是统治上海

的外国资本家的喉舌,但他在这个机构里占一个位置却给他带来许多便利。在这个位置的掩护下, he 可以和中国人民一道做许多反帝、反法西斯、反中国反动派的工作。他理解艾黎的感情,也懂得这个年轻的新西兰人所面临的苦恼。

“你不是痛恨现状么?你不是想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个现状么?”他对艾黎说,“那么你就得好好研究一下理论,找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以及消灭这种现象的办法,好好地读一读这一部书吧。”

艾黎尊重这位“博士”的学问,也尊重他的为人。他不折不扣地接受了他的忠告,认真地研读起《资本论》来。但要透彻弄通这部书上所讲的道理,光凭“苦读寒窗”是不行的。他还得联系实际,得与人讨论,交流心得,解释疑团。巴林博士已经估计到,这种情况在研读这部书的过程中一定会发生。

有一天他和一位名叫海英茨·希普(希伯)的外国人来看艾黎。他们交换了一下有关学习《资本论》的心得以后,巴林和海英茨·希普(希伯)便向艾黎同时提出了一个实际问题:组织一个马列主义小组。这个想法与艾黎的想法不谋而合,很快他们就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于是上海的第一个国际“马列主义小组”就成立了。

所谓“国际”就是因为这个小组的成员不仅有上海不同国籍的外国人,还包括在上海做地下革命工作的中国同志。他们来自各种不同的生活领域。在外国人的成员中,有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美国医生马海德、英国工程师甘普霖、奥地利进步女青年魏璐诗、基督教女青年会的4位女干事……他们不单研究马列主义,他们还研究时事: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恐慌、法西斯的兴起、蒋介石的反共“围剿”、上海的阶级斗争……。当

然,他们更要研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革命斗争。他们所研究的问题一天一天地在增多,他们所接触的方面也一天一天在扩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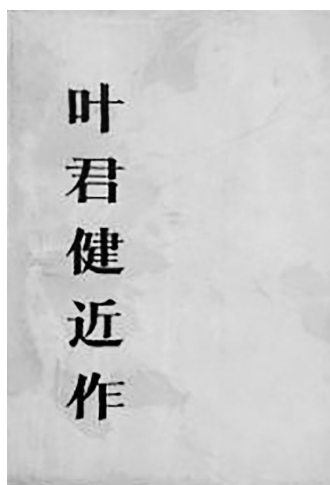
艾黎开始接触到了许多中国的进步文化界人士,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鲁迅和茅盾。鲁迅赠给他《狂人日记》和《苏联版画集》。在和鲁迅的交往中,他不仅在政治的理解上得到许多启发和帮助,同时在文学方面也踏进了一个新的大门。他是一个诗人气质很浓厚的人,平时也偶尔写些诗。从鲁迅的启发中,他开始懂得,写诗并不是单纯为了抒发个人的感情,它有更崇高的目的:诗应该是代表人民的呼声。在新的感情的激励下,他开始把写诗也当作一个严肃的革命工作来看待——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在海外发表了数以千计的诗篇。他还开始学习中文。因为他觉得只有这样他才能和中国人民打成一片。

和中国的革命者及文化人接触,学会了中国语言,使他对于中国的知识面从上海租界扩大到全国,从古代贯穿到今天,这也更进一步加深了他对中国人民的感情和理解。

这时,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把他从消防队调到工业管理部门,任命他为公共租界的工厂督查长。工部局是国际帝国主义统治上海的行政机构。这时艾黎已经懂得了一些马列主义,并且也学会了一些斗争的策略。接受这个“任命”,他可以更好地接触到中国的工人阶级,而且这种接触完全具有“合法性”。当然这并不是说,有了这个合法身份,再加之一一个“白种人”的面孔,做起工作来就可以不需要技巧。租界上的洋人统治者,对于在他的鼻子底下展开的所谓“非法活动”,并不是在睡觉。

有一天,一个非常令人悲恸的消息传到艾黎的耳里来了:上海“马列主义小组”的发起人巴林博士在住宅里被人暗杀了!上海租界里的“秩序”是靠巡捕房来维持的,而巡捕房的基本力量则是来自上海的青红帮——蒋介石就是青红帮的一个成员,是青红帮头子杜月笙的得意门生。巡捕房的那些“包打听”与青红帮的关系可以说是如胶似漆,分不开来。事后查明,巴林博士的暗杀者就是青红帮的成员。但一个“堂堂的白种人”却被有色“劣等民族”中的流氓所杀害,这不仅是对巡捕房的一个讽刺,也是对上海白种人统治阶级的一种侮辱。怎样使这个预谋的事件可以自圆其说呢?公共租界的当局于是便公开宣布:“《大美晚报》的编辑巴林博士因一时神经错乱自杀。”

这对艾黎说来是一堂很好的阶级斗争教育课。什么“优秀的白色人种”和“劣等的有色人种”?这全是帝国主义编造出来的欺骗人民的谎言。艾黎因此更进一步地知道他应该站在什么人一边,因而他也就从此更明确了他的斗争方向。他还从中认识到,这种斗争不能光凭热情,还必须具备高度的警觉性和策略性。



三

艾黎是一个单身汉,但他在上海租界上住的房子却是相当宽敞。当然他不是一个人独

住。租界上房子租金相当贵——特别是一幢像样的房子。他作为租界工部局的一个“官儿”,还得住一幢像样的房子,以便在他的同僚中显得与他的身份相称。为了分担费用,他得找一个伙伴。这个伙伴当然也不能只是分担房租,还得分担他的一部分工作,而且,更重要的,还必须可靠。这样一个人他终于找到了。这就是“马列主义小组”的成员、英国人甘普霖。他是上海英商电力公司的工程师。这个公司供应公共租界全部几百万人的民用和工业用电,因而是一个相当庞大而又重要的资本家企业。甘普霖作为这个企业的工程师,因而也是在上海白种人中一个颇有身份的人。他也得住一幢像样的房子。这样,他们两人合住,无论从经济或身份上讲,都很相称。

但更相称的是,这幢房子能满足工作的需要。长期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和剥削、新近日本对中国明目张胆的入侵,再加之国民党彼此派系间的斗争和对老百姓所进行的日益加深的残酷压榨,早已使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使中国成为了一个正在爆发的火山,广大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正在各地纷纷起来反抗。反抗的浪潮这时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打倒土豪劣绅、消灭军阀的阶段。他们的武装——中国工农红军——不仅占领了大片的农村,还威胁着作为帝国主义在华据点的、由他们的代理人蒋介石所据守的大城市。有的大城市甚至也被红军占领。在红军所到的地区,新的人民政权——苏区——像雨后春笋一般,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这个局面说明蒋介石反动政权将要灭亡,也预示它的后台老板、在中国盘踞了近百年的帝国主义势力也危如累卵。

蒋介石在战栗,帝国主义也在战栗。作为他们在中国进行剥削和聚敛财富的中心的上海,虽然背后有蒋介石的重兵把守,江面上有

各个帝国主义军舰护卫,他们仍然一天一天地感觉到不太安全。恐惧使他们变得疯狂。在疯狂中他们对这里的中国劳动人民就更加紧地推行他们的法西斯统治和白色恐怖。巡捕房的“包打听”和青红帮的匪徒们凝成一气,蒋介石的宪兵和租界上的警察结成为亲密的“兄弟”。他们随时随地抓人,互相“引渡”。在沪西的龙华,每夜可以听见刽子手屠杀中国革命者的枪声,在上海的街头,随时可以看到中国最可爱的青年被绑架,被投进暗无天日的牢窟。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政府,想用这样的恐怖手段,一举而扑灭正在中国燃起来的火焰。但星星之火仍在闪亮,终将汇成燎原大火。在艾黎住的那幢房子里就隐隐地在闪亮着这样一颗火星。中国的爱国青年和坚定的革命者不时到这里来培育它。他们有的白天来,有的夜里来,有的在这里住一阵子——有时3个月,有时半年,有时甚至住一年。由于这幢房子的主人具有特殊的身份,他们可以在这里住得比较安全。他们可以在这里较安心地做他们培育火星的工作。

但这不是一颗孤独的火星。这是中国——不,甚至世界——火焰的组成部分。艾黎每天上班下班乘坐的那辆专用“公务”汽车则成为了扩散这些火种——革命传单和革命书籍的可靠工具;不,它还运送培育这些火种的人:中国地下的革命者和爱国青年。当然它也从别的地方运进一些对革命具有同样重大意义的东西,在这幢房子里加工、复制。有一天,艾黎运进来一包胶卷。这幢房子的第一个主人,工程师甘普霖,不仅是一个电力专家,同时也是一个非常能干的洗片和印片人。他把这些胶卷洗印出来,并且加以放大。吓,100多张有关中国红军战绩和苏区建设的照片!这些宝贵的东西、

传送出去,对中国的革命者,对世界上正在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的人民,对世界的反法西斯战士,该会带来多大的鼓舞和喜悦!

还有,运载革命斗争信息的电波,也不时从这幢房子里被发射出去、或从外面的太空中被接收进来,以适应中国革命者的需要。当然这是一件较复杂的工作。可是甘普霖在这方面也是一个专家,他保证这件工作每天正常地进行。他把这件工作做得那么细致和巧妙,尽管这幢房子已经有人来,有人往,可是除了艾黎、芙丽德·玛娅和有关的中国同志以外,谁也不知道。

玛娅并不住在这幢房子里,但作为一个来自德国的白种人,她可以在这里来往,而且她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职业:在北四川路和一个叫做维特玛娅的奥国女子合开了一个外文书店。但它却不是为上海的外国人服务,而是为了满足中国革命者的需要。上海的中国地下工作者有不少是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数都懂得一些外文。这个外文书店就是收集世界各国革命者所印行的进步书刊,陈列出来,供中国革命者翻阅和选购。事实上,这个书店也是在上海白色恐怖笼罩下隐隐发出闪光的一颗革命火星。它带来世界各地许多革命的信息,无形地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联在一起。它还进口许多国外的进步文艺书籍,也使当时在上海战斗的中国进步作家能够和国外的进步文艺作家互通声息。

除了这些文化工作以外,芙丽德·玛娅还利用她剩余的时间到艾黎的这幢房子里来“作客”。艾黎和甘普霖的社会职业带有一点“官方”的性质,他们得按时上班和下班,但是革命的电波却不能因为他们的不在而停止。芙丽德·玛娅到这幢房子里来的时间恰好与他们上班的时间错开,这样就保证

收发革命电波的那架机器能够正常运转。

“正常运转”的“保证”不仅要求熟练的技巧,还要求高度的革命警惕性。这三个不同国籍的人——艾黎、甘普霖和芙丽德·玛娅——完全满足了这方面的要求,使使用这部机器的有关中国同志也完全可以放心。这一切是进行得那么周密。连艾黎的养子——一个在国民党军队“围剿”时被冲散而变成难民的原洪湖苏区的红小鬼——也不知道,革命的电波就发自他每天睡觉的那个顶楼的房间。

但是租界当局也没有在睡觉。他们时时刻刻在担心他们脚下的火山爆发。他们每天不仅派出大批“包打听”和青红帮匪徒到各处盯梢,而且还利用各种近代化的科学发明侦察空中的动静。有一天艾黎的“公馆”里来了两位不速之客,自称是电力公司营业部门的“检查员”。他们来访的理由是,漏电的情况严重,经查对漏电的地点正是在这幢房子里。他们的话倒是没有错。那架收发革命电波的机器用的是从一根外线进来的电源——接得非常好,看不出任何破绽。工程师甘普霖是这方面出色的行家。这两位“检查员”要求对这幢房子进行全面的检查。

怎么办?艾黎和甘普霖拿出苏格兰产的上好威士忌酒和英国出的醇杜松子酒来款待他们,希望和他们搭上一一点交情,借此软化他们的态度。但在这场短兵相接的阶级斗争中,租界统治者也就放弃了他们平时宣扬的所谓“白人种族优秀论”。尽管艾黎和甘普霖都是颇有身份的白种人,两位来客却不买账,还坚持要检查“漏电”。那么好吧,“欢迎你们检查!”艾黎说。检查当然得从一楼开始。两位客人也是“忠于职守”的行家。他们检查得很仔细,连厕所也不疏

忽。为了表示“合作”,甘普霖也帮助他们检查,先引导他们来到厨房,厨房墙角有一座很高的电冰箱。“这家伙在这里是不是真的作为冷藏食物之用呢?”这两位“检查员”心里暗暗地发出这样一个疑问。艾黎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他猜到了他们的疑问,他对甘普霖使了一个眼色,甘普霖立刻拉开电冰箱,让他们把鼻子伸进去,打开最强的手电筒,把内部的机件也细细地一一察看。

“哎呀!”他们惊讶地说,“有一个机件和电源没有接正!”

甘普霖顺水推舟,也以行家的身份,惊讶地说:“原来故障就出在这里!难怪电漏得那么多!”

事情就是这样。这两位嘴被堵住了。他们再也找不出理由要上楼和进一步的检查。这时“白种人优秀论”才起了一点作用。艾黎热情地请他们再到客厅里来“休息,休息”。对于这位在工部局有一定“可尊敬的职位”的艾黎,他们觉得“盛情难却”,也只好来到客厅里坐下。艾黎和甘普霖再度款待他们威士忌和杜松子酒。他们喝得全身酥软,也再没有劲头上楼。他们起身告辞的时候说:“我们回去将照实报告,看下一步怎么办。”他们走后,不等他们“看下一步怎么办”,艾黎立即开动“公务”汽车,把那架发送革命电波的机器转到别的地方去了。这里得顺便提一句:这辆专用的“公务”汽车,因为它的牌号已经为一些包打听和青红帮之类的人物所注意,现在他又转移了这部机器,艾黎觉得有调换它的必要——虽然他很惋惜,因为这辆汽车为他做了不少革命工作,他对它已经有了某种同志式的感情。他以这辆汽车“零件太旧”,不适应日益增多的“公务”需要为理由,申请租界当局另拨给他一辆新车。考虑到他的“公务繁忙”,当局满

足了他的要求。这算是这次意外事件的一次意外收获。

四

由于“公务”的关系,艾黎不能离开上海。但按照工部局的规定,他工作了四五年以后,可以有一次探亲假,为期8个月,工薪照付。他的头一次探亲假应该是在1931年下半年。这时恰巧长江涨水,华中地区洪水成灾,堤防接二连三地被冲破,汉口已经部分被淹,受到洪水影响的灾民达800多万,仅武汉古镇就逃来30多万灾民。在这样一种形势下,要不要回新西兰探亲呢?这是一次震惊,世界的大水灾,甚至当时的国联——即现在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也不得不出面张罗救济。它还派了一个名叫约翰·辛卜生的英国人为专员来负责这件工作。许多其他国家也送来粮食和衣物救济灾民。因此一个类似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机构就产生了,协同国民党政府展开“救灾”工作。有些外国人也参加这项工作,其中包括艾黎和他的一个朋友贝利老人。

贝利原是一个搞科技的美国人,在上个世纪末就来到中国,曾经在南京金陵大学当过教授。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目睹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满清政府以及后来的军阀、官僚和土豪劣绅的压榨下所受到的苦难,也便想对他们的境遇改变能有所贡献。他像中国早期的启蒙主义者一样,相信科技救国的道理。因此他在哪里工作,就在哪里办一个科技学校,培养中国的技术人员。他的这些努力和对中国的感情常常打动艾黎的心,因而他们就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后来艾黎送了他两本关于原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书。他读完后说:“哎呀,这正是我一生所争取要做的事,而他们

那里却很快就做到了!……我是一个老糊涂蛋!”他的这种认识更加深了艾黎对他的友谊。他这时参加了武汉地区的救灾工作,艾黎便放弃自己的假期,与他合作。

这次“救灾”工作,对艾黎说来,是另一堂很生动的政治课。为了说明问题,这里最好从他的著作《与洪水战斗的人》中引下几段文字:

“国民党政府真是腐化到了疯狂的地步。救济工作只不过是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的遮羞布。他们什么真正工作也不做。各地修补堤防完全出自民众的热情,凭他们的双手来抵御下一次洪水的到来。这是一场群众和贪赃枉法的官僚的斗争。后一种人把他们从救济物资中捞来的钱飞快地换成美金,用他们个人的名字存进外国的银行……”

“当丹水池的堤防决口时,湖北省主席何成浚正在与他的朋友在电力公司经理家晚宴后打牌。他们听到这消息后只是笑了一笑,说:堤防决口后还有铁路堤可挡住水。他们继续打牌。接着铁路堤也被冲垮了,汉口全浸满了水……”

艾黎沿着长江南行,视察水情和堵堤的工作。他经洞庭湖来到了长沙,见到了湖南省主席何键。他“希望他能杜绝官僚对救灾物资的贪污盗窃活动,同时对修补堤防给予大力协助”。他此行的结果是:

“他冷淡地接见了。我对他说明了许多事实。于是他便大放厥词,骂起共产党来……他说,我是一个外国人,不了解中国情况。中国素来是常有水灾的国家,而且中国的人口是那么多,淹死一些也无关紧要,农民自己会去修堤。当前的不是救济水灾、修补堤防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当前的主要工作是剿共,拥护蒋委员长,扩大军队,

保护秩序,使世界各国的人可以来中国做生意……。”

这种看法正代表国民党所有封建买办官僚的看法。洪水和人民的死亡,对他们说来,是无所谓的事情。他们所害怕的是共产党。他们所关心的是趁洪湖下游大部分地区都遭到洪水泛滥之机,好对该地区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进行围剿。洪湖一带苏区的大批群众遭到屠杀,有不少的人流离失所,成为难民。这期间,他们流落到武汉地区的也不少。在武昌洪山一带,难民都自己搭起棚子,准备暂时渡过难关。艾黎计划拨出国外运来救济的粮食和物资供应他们,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同时也利用他们的劳力,把他们组织起来,积极展开修补堤防的工作。但国民党政府不仅不考虑这个意见,反而认为难民就是共产党,对他们进行残酷的迫害和屠杀。凡是难民中比较年轻的人——有时也包括老人和小孩——他们就挑出来,不加审讯就拉去枪毙。这里最好从艾黎的著作《一些细节》中引下两段,以说明国民党政府的残暴、当时受难者的英雄气概和艾黎本人的感情:

“这是一个冬天的日子。稀薄的飞雪在向地上飘来,寒风在街头扫过。我裹着大衣站在一旁,望见一个人群的行列在前面行进。所谓‘罪犯’,他们的双手被绑在背后,走在这群人的中间,他们两旁是武装到了牙齿的押解他们的宪警。

……这些所谓‘罪犯’全是政治犯。他们有的是男子和女子,有的是中、小学生、农民和工人。走在他们最后面的那个人——他的面孔和眼睛,对我说来,至今仍然是栩栩如生。他看起来只不过20来岁——他们大多数都是这个年纪,他的身材很高,但很瘦削。他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军服——风把

它吹得紧匝着他瘦高的身体。他的头昂然直立,他的眼睛镇定,他面带笑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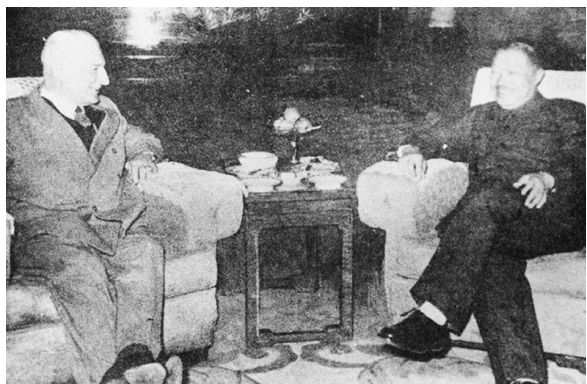
他的面色和笑容,在我脑海里留下的印象,其尖锐的程度正好像一颗子弹穿进我的心房。当他的眼睛和我的眼睛相遇的时候,当他看着周围的群众——胖胖的店老板、街上好奇的行人、宪警和这整个肮脏的场面——的时候,我也想立即采取一项行动:扔掉我身上裹着的那件温暖的大衣,加入他的行列,和他一道走向那阴惨惨的扬子江畔——在那里他的生命将要被夺走……”

这就是洪水泛滥灾区的情景:一边是国民党政府的荒淫无耻,发灾难财,一边是劳苦大众和革命者的受难。尽管反动派作威作福,但他们在心的深处仍是非常害怕人民。对摩集在武汉地区的灾民他们一直放心不下。武汉警备司令叶蓬——此人后来跟着汪精卫当了汉奸——忽然下令,要用枪杆子逼着灾民在一周内疏散到武汉市区以外的4个地点。武汉的灾民有30多万人,当时可用的交通工具,每天充其量只能疏散1.5万人,如果按照这个“命令”办事,势必会有大批灾民在枪杆子威逼下和饥寒中丧生。这时艾黎促动经手国外运来救济物资的外籍人士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一个请求,由他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人设法来处理灾民的疏散问题,借此也同时取得处理一部分这些救济物资的权利。这个权利艾黎算是终于取得了。

通过这个方式灾民才算得到了一些粮食,可以自力更生。这样,他们逐步离开了这个白色恐怖笼罩的地区。但剩下的救济物资,就此留给国民党政府搞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活动吗?不,决不能这样作。艾黎巡视过武汉外围洪水泛滥的地区。有的地方,老百姓倒真是靠自己的力量,在日夜修补堤

防,抵御新的洪水袭击。洪湖苏区及其附近地区就是如此。但是由于洪水冲走了庄稼,他们面临着严重的饥谨。为什么不把粮食和其它救济物资运送一部分给他们呢?但这个计划要取得国民党政府同意,却是比上天还难。不过有一个理由国民党政府却无论如何也驳不倒,那就是武汉地区防洪没有什么动静,而在武汉的上游老百姓却在热火朝天地修补堤防,以堵住大水淹进武汉。这样一些人,不管怎么说,有权利得到救济的物资。这些人就住在洪湖外的新堤一带。

国民党政府拗不过艾黎的坚持,只好同意送几船粮食前往新堤。但为了保证这些物资不落进共产党手中,国民党政府还特派一批“丘八”押送。于是一支载满了粮食的船队,便在反动武装的“保护”下,浩浩荡荡地开往新堤。但这支船队还没有完全到达目的地以前,两边岸上就响起了枪声,这支船队被突然出现的人民武装截留住了。那些押船的“丘八”成了红军的俘虏。但红军却没有把他们当成俘虏看待。相反,“热情”地款待了他们一番——因为他们究竟送来了洪湖苏区急迫需要的粮食。他们吃饱了饭后,又安然地乘着空船回到武汉。



与贺龙元帅交谈洪湖区的革命历史(1963)

这是一个“意外”,因为根据国民党政府的吹嘘,他们已经把这个地区的共产党“剿灭

干净”了。艾黎知道,共产党是无法“剿灭”的、更谈不上“干净”。但是他却用不着对这次“意外”负责。那两岸的枪声已经为他做了辩解。此外,那些押船的丘八可以作证:他“没有料到”这里还有红军,国民党也没有告诉他有这种可能。

1963年夏天,贺龙同志见到艾黎的时候,回忆起这件事,便以半幽默半严肃的口吻,做了这样的解释:

“艾黎同志,我们很抱歉,1932年你给我们送粮食来,我们当时没有欢迎你,相反,我们还放了枪;但是我们相信,你会谅解,也会同意:这几枪放得非常得体,非常必要!”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叶君健(1914—1999),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作家。生前曾任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大学教授,英、法文《中国文学》杂志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中国笔会副会长,中国翻译家协会副会长,世界文化理事会的达芬奇文学、艺术奖评委。著有《叶君健小说选》,长篇《土地》、《寂静的群山》,中篇《开垦者的命运》,散文《两京散记》,翻译《安徒生童话全集》等。他所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全集》获得国内外学者、专家的极高评价。)

路易·艾黎:一位新西兰人的抗日情缘

聂广涛

甘肃河西走廊中部的山丹县城南,在绿树环抱的陵园中,有两座并排的陵墓,艾黎、何克的名字镶嵌在黑色大理石墓碑上。他们就是在抗日战争的特殊环境中,救助并抚育我成长的异国养父。

路易·艾黎是新西兰人,乔治·何克是英国人。日本鬼子的侵略战争,摧毁了我的家,我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正是他们的救助和抚养,才使我得以生存下来,并且长大成人,三个国家一家人的特殊家庭,所谱写的动人故事,闪耀着国际主义的灿烂光辉,将为世人所铭记。

搞工合运动,甘做“中国头号白人苦力”

1927年4月,路易·艾黎从新西兰来到中国,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已经在中国生活、工作了10年。这期间,他先在上海法租界工部局消防处任督察,两年后,担任工厂安全督察长。1932年,在上海的美国人史沫特莱女士介绍艾黎与宋庆龄相识。在宋庆龄的倡导下,艾黎组建了外国人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参加这个小组的人有史沫特莱、斯诺、马海德等。通过学习,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投身到中国革命和抗日的实践中,并且成为人所共知的著名国际友人。

开展工业合作运动,支援抗日斗争,是艾黎抗日活动的大手笔。1937年8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上海,工厂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工人

失业,流离失所。当时全国工业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沪宁杭地区,一旦被敌人占领,中国的抗战就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因此,转移、疏散工厂,组建新的适应战时的工业合作社,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在宋庆龄、周恩来等人的支持下,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简称“工合”)于1938年8月在武汉成立。孔祥熙任理事长,艾黎为行政院负责工合事务的技术顾问。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艾黎组织把武汉64家企业搬到了宝鸡。由于毗邻西安、延安,西迁到这里的企业能够重新复工生产,不仅为持久抗战保存了工业设施,还安置了大批的失业工人。这些企业所生产的棉纱、棉布、军毯在支援抗战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工合成立后,相继在洛阳、宝鸡、成都、赣州建立了办事处,分别负责中原、西北、西南、东南地区的工业合作社的组建和运行。合作社的口号是“努力干、一起干”。兴办的小厂有机械、化工、面粉、造纸、纺织、被服、印刷、炼铁等等。由于它的规模不大,技术含量相对不高,投资小,见效快的特点,便于避开敌人的轰炸而免遭破坏,很适合于隐蔽、转移。它所生产、制造的产品,品种繁多,涵盖民用军需的许多方面。工合事业由于适应战时需要,最初得以迅速发展。到1940年10月,短短两年时间,已在全国16个省,建立了2400多个

各类合作社。从业人口约2万人。

艾黎曾三次到延安访问,工合事业得到毛主席的肯定,并欢迎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地区,建立各种合作社。这样,工合就成了既能够在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又能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存在和发展的组织,十分有利于坚持全面抗战。在当时通信、交通设施都很落后的情况下,艾黎跑遍了中国大部分地区,行程2.4万多公里,乘火车,搭汽车,骑马,许多时候还只能骑自行车。他不畏艰险,以惊人的毅力,克服无数的困难才清楚地了解到各地的真实、具体的情况,从而采取有效的措施,把来自世界各地的捐款、物资调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使其在抗日战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埃德加·斯诺早在1941年2月8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路易·艾黎——建设中华的猛士》,登载在美国的《星期六晚邮报》上。这篇文章介绍了艾黎在中国搞工合运动,已经取得的成就和意义,赞扬了艾黎不辞劳苦,排除万难,支持抗战的坚强毅力,肯定了艾黎自己甘做“中国的头号白人苦力”的精神。

创办学校,为抗日救国培养人才

工合事业的发展,始终是国民党官僚的一块心病。艾黎于1942年被撤销行政院工合技术顾问的职务,被赶出了工合总部。但他是一个不屈不挠的人。在被撤销职务后,他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培训技术和管理人才方面。创办培黎学校,培养人才,是他在抗战后期具有战略意义的壮举,为世人所称颂。前几年上演的电影《黄石的孩子》的部分情节,就取材于这所学校。

1942年,艾黎把任西北工合秘书的英国人乔治·何克,调到位于秦岭南部的小镇双石铺,担任培黎学校的校长。何克是英国人,1937年于牛津大学毕业,同年来到中国。先在上海,后去延安、武汉。他目睹侵华日军的累累罪行,实在忍无可忍,决心留在中国,揭露

日军残杀中国人民的侵略事实,参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何克到任培黎学校校长后,陆续招收了60余名贫苦和战争难民子弟入学,他利用嘉陵江的水作动力,兴修纺织厂、机械厂,亲自带领学生、工人一起干,丝毫没有英国绅士的影子!到1944年,学校初具规模,逐步完善了半工半读的教学秩序。他既是校长,又是老师。校内常常传出欢乐、雄壮的抗日歌曲,学校办得生机勃勃。

收养孤儿,细心关爱但从不娇惯

1941年春,在宝鸡西北工合内部,掀起了一股排挤、打击、迫害正直的进步人士的逆流,搜查缉捕共产党员,是他们最阴险、最毒辣的阴谋。我的父亲聂长林当时也在宝鸡工合,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当组织上得知他已经列上被缉捕名单时,立即决定调他离开宝鸡,先去中条山木炭合作社暂时躲避,等待时机途经洛阳,再去晋东南。因此,我的父亲连夜离家出走,根本顾不了安置家里的一切。三个月后,他在洛阳等待过河证件,准备渡过黄河去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时,遇到从那里刚刚回来不久的何克。何克答应关照父亲一家:四个年幼男孩子和他们的妈妈。回到宝鸡后,何克就把我的两个哥哥带回双石铺,成了培黎学校早期的学生。

哥哥去双石铺以后,我和弟弟继续留在妈妈身边。但不久妈妈因病在宝鸡的医院去世,我成了没有父母的孤儿。一开始,我和弟弟被送到了宝鸡孤儿院。后来,也就是1942年初冬,艾黎把我和弟弟带到双石铺,安置到柏家坪的窑洞里,6岁的我同艾黎、何克的共同生活就从此开始了。

何克和艾黎特意买了一只羊,把产羔后的羊奶给我喝,为我补充营养。他们害怕我寂寞,还买了两只兔子,供我逗着玩,还弄来一只黄狗,天天摇着尾巴陪着我。艾黎、何克晚上

回来,常常把我抱在他们的大腿上,给我讲故事,教我学算术,看表上的钟点,教我学习简单的英语会话。因为我太小,还不能在培黎学校上学,他们就送我去上小学。双石铺这个温馨的家,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脑海里储存着许多童年美好的回忆。

在这里,在抗战的特殊时期,我享受了两个外国人赋予我的关爱。这种在特殊环境中,汇聚而成的特殊的家,可以说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其实,不只是我,当时还包括我的两个哥哥在内其他60余名战争孤儿,生活在他们所办的培黎学校中。随着战局的变化,为了保护这些孩子不受战争的侵扰,学校于1944年底开始往甘肃山丹县搬迁,1945年春天,学生老师和设备全部搬迁完毕。何克亲自带领学生修建废弃的庙宇,将其改造成为教室、宿舍、实验车间。教学秩序很快恢复正常。他远离故土身居异乡,久别英国亲人,却在中国找到了他为之奋斗的正义事业。为了弥补办学经费的不足,他把家里寄给他的钱都捐助给学校。很可惜,他没能亲眼看到抗战胜利这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破伤风向袭来,由于医疗条件有限,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他在1945年7月22日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临终前,艾黎守候在他的身边。他要来笔和纸,写下了“把我的一切送给培黎学校”。那时何克年仅30岁。

艾黎在自传里这样写道:“何克临死前要求我照看这几个孩子,我就把他们接过来了。老大和老二住在学校的宿舍里,两个小的——老三和老四一直跟我住在擂台,直到解放。”何克逝世后,艾黎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他把全部的精力花在山丹办学上。他不仅要设法搞办学经费,增添教学设备,聘请中外教师,还要亲自教学上课,教授英文、机械原理、农机运用等,还要照顾我们几个孩子的

饮食起居,包括给我的弟弟晾晒尿床后的被褥。他可够辛苦的了!学校搬到山丹后,我们身边还多了几位小伙伴。除了我和弟弟外,还有张维善、房元德。报刊上常见的艾黎同四个孩子,就是我们这四个人。艾黎疼爱我们,但从不娇惯我们。扫地,烧炕,都是我们必须动手做的事情。除了上文化课以外,每人也和其他同学一样,去实习组劳动。我去了纺织组后到机械组,弟弟去织袜组,纽扣组。这样每人至少要学会两样技术。

谆谆教诲,“回去后,不要当少爷!”

解放后,失散多年的父亲通过组织找到了我们,要求我们回东北,艾黎只好忍痛割爱,送我们回老家团圆。在北京,艾黎亲自到当时的前门火车站,送我们回老家。车就要开了,还舍不得离去。临别既不是拥抱,也不是握手,他拍了我一把,语重心长地说:“回去后,不要当少爷!”眼里充满泪水。至今,好几十年过去了,此情此景依旧是那么清晰,我记住了他的临别赠言。我理解,革命胜利了,昔日的孤儿,一下子变成了“干部子弟”,在众人面前,似乎与众不同,表现出干部家庭的优越感,这样,弄不好就会在长大成人后,变成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这是他极其厌恶,极为担心的事。

我们聂家兄弟四人回到东北以后,艾黎不得不忍受失去我们的寂寞和痛苦。值得庆幸的是,我的二哥和四弟后来都在北京工作,在艾黎晚年的时候,我的哥哥和弟弟在周末,常常带着孩子去看望他,使他享受到老年人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弟弟还被破格批准,照顾他的起居,天天下班后,陪伴在他的身边。

艾黎、何克都是平凡的人。何克在中国亲身参加了八年抗战,把他的青春年华,献给了争取民族生存的中华民族;艾黎,在中国生活、工作了60年,献出了自己的一生,被誉为

“中国的新西兰人”。他们远隔重洋来到中国，不为个人的功名利禄，在中国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定位了人生的目标，献出了自己的精力和才华，他们应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

敬和纪念。

（本文来源自参考消息网2015.08.14，作者聂广涛系艾黎亲属、路易·艾黎研究中心特邀顾问）

发扬艾黎精神 赓续红色血脉

——培黎老校友张贤玮的来信

兰州城市学院

路易·艾黎研究中心：

在纪念路易·艾黎诞辰125周年之际，作为艾黎的学生，培黎学校第一批学员、中国工合会员、九十九岁离休干部，我的心情难以平静，深切怀念校长艾黎，感谢他和工合培校对我等培校学子的关怀、教育和培养，感谢他为我们国家抗战、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我对工合培校怀着深厚的感情，一句话概括，没有培校，就没有我的今天。同时，我由衷地感谢兰州城市学院和艾黎研究中心近年来在重温工合历史、传承艾黎精神所付出努力，祝贺你们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作为年少处境困顿的农家子弟，是工合培校，是艾黎、何克校长在战乱饥荒年岁给我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求学机会和不再受饿受冻的生活条件；教育我等培黎学子树立忠诚奉献艰苦朴素的做人之道、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钻研之道、半工半读强体健身的毅力之道。这些，对我等培黎学子在新中国的石油、矿业、纺织、冶炼工业等领域和各条战线发挥了独特的技术人才作用和培黎桥梁纽带作用。为此，培黎学校和艾黎、何克校长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和赞许。

如今，在有生之年，我欣慰看到赓续、传承于培黎的兰州城市学院、培黎职业学院（甘肃省山丹培黎学校）等学校，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全体师生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丹培黎学校重要讲话精神，秉承路易·艾黎“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办学理念，正在激情满怀、奋力开启职业教育新篇章。我也欣慰地感受到路易·艾黎

研究中心领导和研究人员严谨敬业、深入开展历史研究、宣传工合培校、大力弘扬艾黎精神的不懈努力及取得的突出成绩，使我深受感动，是你们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人们对工合和培校曾经的误解，使我们在耄耋之年能挺起脊梁自信地说：我们培校学子为国家做出了培校学子应有贡献！

我希望广大学子踊跃加入职业教育，发扬艾黎精神，赓续红色血脉，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利用好学院各类先进的教育教学资源，忠诚朴素，刻苦钻研，以战略眼光彰显学院特色，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交流，全方位提升自己的知识、技能和本领，为将来参加国家建设和实现人生理想砥砺前行。

再次感谢学院领导和广大师生为学院近年来跨越式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感谢路易·艾黎研究中心为弘扬艾黎精神所付出的艰辛努力！让我们一道传承好、发展好艾黎精神！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

张贤玮

2022年11月21日

作者简介

张贤玮，男，陕西旬邑人，现年99岁。中国工合会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陕西省渭南市棉花公司离休干部。他是路易·艾黎和乔治·何克最早的学生之一；1942年至1950年期间，他先后在陕西双石铺培校、四川成都培校和甘肃山丹培校以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湖南邵阳乡村工业示范处学习与工作。现居住在陕西省兴平市。

半个多世纪的友谊

马海德

路易·艾黎是个杰出的人。“杰出”一词曾多次被人滥用,但用“杰出”来形容艾黎确是恰到好处。比如说,很少有人能离开祖国而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他国人民,艾黎却这么做了。艾黎这个人,遇到不正义的事,会暴跳如雷。但是对于贫病以及下层社会的人,他却无比同情,他理解他们,他关怀他们。

艾黎的杰出,在于他既富于幻想而又脚踏实地做了大量的工作。艾黎这个人,不仅了解中国建国前近百年或者近50年的历史,而且也了解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他总是通过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以及这段历史在当代所起的作用来看待中国的一切。

艾黎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深知社会主义的政权能为普通人做什么。实际上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和愿望。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艾黎一直是我的朋友、尊师和我所信赖的人。

人们总是记着一个人生前的所作所为。艾黎以及很多热爱中国的人,为中国人民做了很多工作,他们的成就在今后几十年、可能几个世纪,有的人甚至永远都将起着重要的作用。

对于中国甚至世界都是十分幸运的,艾黎的一生度过了90年的漫长岁月,他的长寿使得他能做出巨大的贡献。今天,艾黎的一

些理想已成为现实,有些还要由后人来实现,但总归会有结果的。这些理想的实现是对艾黎最好的纪念。

我是1934年和艾黎相识的,在将近55年的交往中,我们有着相同的经历和相同的见解。1933年,由于对中国感兴趣,我只身来到上海,年仅23岁。看到中国劳动人民饥寒交迫,我很痛苦,脑子里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异国他乡,形单影只,日子很不好过,很希望有人能给我引路。在上海我一面行医,一面探索那萦绕在脑际的问题。那时我常去一家德国人开的书店看书,店主人是魏德迈女士。在那里,一位叫派尔美国人把我介绍给艾黎。艾黎是新西兰人,身体健壮,两眼炯炯有神。他的谈吐,他对事物的洞察力以及爽朗的性格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以后,我常见他,接触越多,我越敬重他。从那时到现在,已经50多年了,我们的友谊始终不渝,而且成为我不断前进的巨大动力。同艾黎的相识给我展现了一种新的生活,是他把我引上了中国革命的道路。

我医治的病人越多,发现的社会问题也越多。那时的中国,一方面是饥饿和痛苦,一方面是荒淫和花天酒地,形成鲜明的可憎的对照。作为医生,良心驱使我改变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可是我不知从何做起,我便去找艾黎。艾黎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

让我去工厂看看。我去了,工厂的情景使我大为震惊。童工受着残酷的剥削,吸着含有铅毒的空气,长期的营养不良而面黄肌瘦。艾黎说:“这只是表面现象,要找到解决的办法,必须找到隐藏在表面现象后面的根本原因。”之后,我们又谈过几次,我终于领悟到一切罪恶的根源都在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要改变中国不公平的社会现象,首先得改变中国的根本社会制度。这是艾黎给我上的第一堂课。后来我参加了他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我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

艾黎对被压迫人民充满了同情,只要他看到欺压人的事情,总是义愤填膺。正是出于这种感情,艾黎曾收养过7个无家可归的男孩。对艾黎说来,没有比人民的苦难更使他痛心的了。他对人民深沉的爱,不仅影响了我,也影响了斯诺和许多人。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一书,也凝聚着艾黎对被压迫人民的这种感情。

在上海时,艾黎常在周末带我去农村,使我有机会接触到各种普普通通的农民,了解农民的疾苦。艾黎知识渊博,他给我讲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故事,使我在不知不觉中加深了对中国被压迫人民革命事业的同情和支持。

艾黎在上海的公开身份是工部局的督察,同时为中国共产党做地下工作。很多次,他坐人力车为红军部队运送武器。他气宇轩昂地靠在车椅上,无人敢过问,而在他的脚下却藏着一箱枪支弹药。我曾问他怕不怕被敌人抓住,他笑道:“干革命就要置生命于度外,这样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艾黎一生未婚,他是一个感情真挚而深沉的人,他需要家庭的温暖。但是,干革命是要担风险的,往往不允许有私人联系。为了

革命的利益,他牺牲了个人的幸福,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中国人民的事业。

宋庆龄很了解艾黎,曾这样评论过他:“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

1936年3月,在宋庆龄的领导下,艾黎和格兰尼奇等朋友在上海创办了一家向全世界介绍中国抗日斗争的刊物《中国呼声》。艾黎多次约我为该刊写稿,他想把我锻炼成一个革命的医生,不但能操手术刀,也能拿笔杆子。他为我找来剪报供写作参考,并为我修饰文字,我在《中国呼声》上发表的文章,很多是经过艾黎加工修改而成的。

在艾黎的指导下,我进步很快。我认识到,要改变中国的社会状况,单靠行医是不行的。我可以一天治好一个病人,可那个社会制度却能让成千上万人在同一天死去。唯一的办法就是革命,于是我渴望着能到解放区去参加革命的军队。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艾黎,他高兴地看到他的学生已经准备迈这一步了。他说:“好极了,我一定帮助你。”他为了我的事四处奔走。在宋庆龄的协助下,我不久以后终于踏上了前往陕北的征途。从此,我和艾黎一别就是几年。在延安时,我们之间联系虽然不能像以前那样频繁,但我通过可靠的途径仍与艾黎保持书信往来。

1939年12月,艾黎来到延安解放区开展工合运动,我们久别重逢,都特别的高兴。一有空我们就去打猎,艾黎的枪法极好。我们一路走,一路谈。艾黎对解放区的工作很关心,问了很多问题。他特别强调要搞统一战线,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革命总是多一些好人,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增强人们的战斗意志。

经他介绍,我又认识了另外一些愿意帮

助中国革命的外国朋友。艾黎并非单枪匹马，他是动力的源泉，是领袖，他机智勇敢又有组织能力。为了共同的目标，艾黎和斯诺、威尔斯、史沫特莱等人联合起来建立了工业合作社。

进城后我到北京工作，那时艾黎在甘肃省的山丹办培黎学校。9年间，在困难环境中他造就了一大批技术管理人才。他请我去那看看，向我讲述了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办学思想。我们背着背包，四处访古，他向我介绍中国的古文化。从山丹回来，我背包装满了各式各样新石器时代的古物碎片，至今还珍藏在我家中。

1953年艾黎移居北京以后，我们又能够经常见面了。每个星期一和星期四的下午，是我们定期聚会的时间。参加我们聚会的还有汉斯·米勒教授、章文晋、吴蔚然医生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我们在一起讨论国内国际大事，谈到世界上的矛盾，简直欲罢不能。我们也谈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史、文学等问题。即使在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的聚会也从未间断。只不过讨论的课题更广泛了，从红卫兵的作为到老一辈革命家的遭遇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前景和与我们命运相关的中国的命运。那几年，很多人的日子都不好过。当年不惧被蒋介石悬赏捉拿的人，在残酷战争的岁月里殊死战斗的人，在敌人的屠刀面前视死如归的人，竟要忍受红卫兵的侮辱，对历史的亵渎使人悲痛。在这种情况下，艾黎再次表现了他的大智大勇，他从不为那动荡不安的局势和周围迭起的怨声所压倒。艾黎很难过，但仍镇定自若，坚持他自己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对中国人民的感情从未动摇过。“四人帮”要我们在中国的这些外国人也搞批判，艾黎、米勒和我都拒绝了。那时我们很痛苦，但从未丧失信心。每次见面我们都互相

勉励，并发誓绝不写半个字批判老一辈革命家。因此“四人帮”很恨我们。

粉碎“四人帮”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中国带来了春天，也带来了希望和朝气。我们为新的成就感到欢欣鼓舞。艾黎对中国农村感情极深，每当我们谈及农村改革带来的巨变时，这位新西兰老人的脸上顿时现出笑容。

艾黎很重感情，热爱朋友和同志，当我患癌症住院时，艾黎每天都来看望，每次都带着一束鲜花、一些小点心和小菜，还有他听到的最新消息。亲兄弟之间也未必如此。当艾黎有病时，我也总要守在他身边。对于我们，精神上的相通比血缘关系还要重要。

50多年来，每当我困惑不解时，艾黎为我指明方向；当我有困难时，他给我勇气。半个多世纪的交往中，我们互相关心、互相理解、互相勉励、互相支持，为着共同的目标前进。

艾黎1927年来华到他去世，在中国度过了60个春秋。我衷心希望，我对这一段重要历史时期我们之间牢固友谊的回忆，能使中国青年一代更好地了解路易·艾黎——这位国际进步事业的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我还希望他们能向他学习，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努力，并做出贡献。



艾黎与好友马海德

为了未来而教育：路易·艾黎 与20世纪中国职业教育的转型

米 靖

编者按：路易·艾黎将人生中的60年奉献给中国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事业，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他于1927年来到中国，发起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并创办培黎工艺学校，其教育实践有力推动着20世纪中国职业教育的转型发展；他立足中国国情而倡导的具有前瞻性的职业教育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时至今日仍然值得赓续和弘扬。

—

在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15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从抗日战争时期兴起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及与该运动相融合的“培黎工艺学校”是我国职业教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始于国难深重时期强力维护和推进国家工业发展并培养急需之技术人才的运动，在中国近现代抗争史和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占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其内在精神与价值历经时代变迁，绵延发展至今。

这一重要历史进程与一位热爱中国人

民、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长期投身于中国革命并参与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事业的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密不可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与艾黎有深厚友谊，对其做出的重要贡献高度肯定。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新西兰进行国事访问，在新西兰各界举行的欢迎招待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先生1927年远赴中国，将毕生献给了中国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事业”。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北京培黎职业学院回信，盛赞路易·艾黎等人发起成立的工合国际为支援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重要

二

贡献,高度评价了在华工作生活 60 年的艾黎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的不懈努力和为中国人民和新西兰人民架起的友谊之桥,称他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大多与艾黎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邓小平同志在 1977 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为艾黎举办的八十寿辰宴会上致辞时就称其为“我们的老战士、老朋友、老同志”,并深情地说:“为中国革命事业尽力的国际朋友有千千万万,像艾黎同志那样五十年如一日,在我们艰难困苦的时期,在我们创业的时期,在我们胜利以后,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可见,艾黎在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地位之重要,这份尊敬背后正是艾黎对中国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

站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历史关键点,研究路易·艾黎这位在党史上享誉甚高的国际友人,我们可以发现,他与中国 20 世纪职业教育思想与实践的构建与转型有着深厚的内在关联。他面对中国抗日战争时民族救亡的深重灾难和自强图存的历史需求,对中国人民的强大力量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始终抱有从未动摇的信任,并竭尽全力倡导和推动小型工业合作社,调动广大农村地区的生产力来推进中国工业化发展进程。而且,他深刻地意识到举办工艺和技术学校培养支撑工业合作的人才更是关键基石和时代之需,并不断地形成了立足需求、面向大众、手脑并用、创造分析、合作共处和教学生产相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思想和实践体系,为 20 世纪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探索出一条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的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之路。

路易·艾黎(Rewi Alley, 1897—1987),新西兰人,在中新两国都享有极高声望。他一生热爱和平、热爱中国,奉行国际人道主义。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且身负重伤,投身中国革命后为中国人民抵抗侵略和建立新中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特别是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现代工业和教育事业发展深谋远虑、倾心奉献、身体力行,其作为核心发起人和关键领导者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和培黎工艺学校成为 20 世纪 30—40 年代中国经济和教育发展史上的奇迹;他本人热爱中国文化且富有研究,将唐诗特别是李白、杜甫的名篇以及中国少数民族的史诗译成英文在海外传播。他一生著作丰厚,出版各类作品达 60 余部,并因之享有崇高的学术声誉。

(一)接受良好教育并成长为一战的卓越战士

艾黎出生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以西 60 公里的斯普林菲尔德坎特伯雷镇,在六位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他的父亲弗雷德里克·詹姆斯·艾利(Frederick James Alley)是一名教师,醉心于康德哲学,曾撰文研究教育改革、土地所有权和农业发展。母亲克拉拉·玛丽亚·白金汉(Clara Maria Buckingham)是英国移民的后代,结婚前是一名女教师,曾积极为妇女的各项权利和事业奔走努力,对艾黎的中国事业倾心支持。

艾黎从小受到良好教育,高中时期成为学校军事学员团的成员。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于 1916 年初报名加入新西兰远征军,在一战期间最为惨烈的索姆河战役中被弹片击中肩膀而受伤。在法国战斗期间,艾黎偶遇中国劳工军并与他们并肩作

战。1918年8月,艾黎和战友成功袭击德国机枪阵地并获取情报,因勇敢无畏,被授予军事勋章。在之后的战役中,他再次身受重伤,在法国接受了手术并在英国疗养恢复,1919年初回到新西兰。

(二) 热切关注并彻底投身中国革命事业

艾黎回国后通过《奥克兰周报》等渠道不间断地了解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当时的中国,“新兴的革命力量,正在对旧的势力进行摧枯拉朽式的全面扫荡。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中国在变动,世界也不能不变动,而这个世界也必须变动。到中国去!他起这样一个想法,便也就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1927年4月21日,艾黎抱着“去看看中国革命”的想法来到中国上海,在工作之余与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建立友谊,并和其他几个朋友一起组建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利用假期在上海、内蒙古和陕西开展调查,参加饥荒救济工作,使他对中国人民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与此同时,他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立了联系,并积极完成地下党交给的任务,“这往往是颇为冒险的”。

1937年,艾黎赴英国、欧洲和北美洲考察工业发展情况,参观了许多工厂。当时中国的工业之都上海被日军轰炸,日本人故意瞄准工业区,以压倒中国工业,这导致工厂一片废墟,数千名上海工人流离失所。面对日本侵华的不断加剧,中国如何保持工业生产成为艾黎思考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1937年,在宋庆龄等人的大力支持下,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等联合中国多位爱国者,以推动中国这个古老的农业国家加速工业化进程为目的,发起了中国工业合作运

动,即“工合”(Gung Ho)运动,并由艾黎负责起草组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和发展“工合”社的计划。

“工合”运动产生于中国抗战危难时期,这是一场发动全民族力量的生产自救运动,其宗旨是“树立战时的轻工业,以应军需之用;救济流亡失业的技术工人及难民,以备在抗战的过程中奠定国防重工业的基础;为防止资本主义的流弊,主要办理合作经营”,它需要人民参与、组织有序、资金充沛以及技术支持。“工合”运动组织工人和难民,避开大城市和港口,在中国腹地建立工业制造合作社,生产和制造战时中国人民及军队所需的物品甚至武器,以全力协助抗日斗争,并为成千上万的难民提供生计。

此项计划的实现需要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以团结所有力量。埃德加·斯诺提名艾黎担任这一领导角色,并承担技术顾问的所有工作。艾黎以极大热情和高度责任感亲力亲为,推动和管理工合运动。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他行程28000多公里,许多时候都是骑自行车、步行或骑马。其工作成效显著,两年间形成一个遍布16个省、涉及50多种工业、包括3000多家小型合作工厂并雇用了30多万名工人的工业生产格局,产品包括纺织品、玻璃制品、糖、煤炭和电机等消费品,还为抗日军队提供毛毯、帐篷、担架、制服以及军事用品等。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为了配合工业合作协会组织工合运动,艾黎决定在香港成立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1939年7月21日,香港工合国际委员会成立,由艾黎担任执行秘书,推宋庆龄为名誉主席,开始接受美、英、新西兰等国人民和海外华侨的捐赠。

艾黎于1939—1941年为工合运动先后

三次去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得到他们的高度赞赏和热情支持。艾黎在延安三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专门与他进行会谈,给他的影响极深。他在日后的回忆中说:“告别时,我感到,这里才是领导中国千百万人的力量和能力之所在,这力量似乎来自千百万人民本身,他好像是我所认识的每个农民和工人的化身。”在得到了毛泽东的准许后,艾黎亲自为延安的工合事业起草了发展计划。

“工合”运动先后提倡“建立三万所合作社”“予数百万人以新生命”“恢复战前工业生产量”,以及“建设经济国防,支持长期抗战”“协助国家工业化”等口号,这充分体现了这场运动推动中国工业在特殊时期得以发展的根本目的。1940年4月,美国《时代周刊》刊发文章评论这场运动的成效,“合作社的优势很多。这些单位可以移动,容易隐藏,易于安置,不像大型工厂那样成为日本轰炸机的明显目标。他们提供军需,而中国还没有其他能够如此有效地生产军需的部门。……他们为数百万为自由而跋涉向西徒步旅行的难民提供了希望,以工作形式提供持久救济……。合作社使整个社会焕发了活力”。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艾黎提出的“Gung Ho”这一口号已经成为英语中的一个词汇,其意为Work-Together,是艾黎倡导的“努力干,一起干”工合精神的体现。

(三)永久定居新中国并全力推进中新合作

新中国成立后,艾黎选择在新中国永久生活下去。他更多地致力于推动中国与新西兰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1952年,他参加了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担任了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联络委员会秘书,并以

此身份访问了万隆、开罗、德里、河内、哈瓦那、赫尔辛基、雅加达、平壤和斯德哥尔摩。在新西兰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艾黎成为新西兰的非官方驻华大使。

艾黎努力将不断变化的中国广泛地向世界介绍,也致力于将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如唐诗翻译成英文。1982年,北京授予他荣誉公民权。1983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中断活动30多年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北京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正式恢复了活动。1987年12月27日,艾黎因脑血管栓塞并发心脏功能衰弱去世,终年90岁。

三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精髓和原则,它揭示了近代大工业生产以来人类教育变革的基本方向和模式。艾黎推动的“工合”运动不断探索着中国工业化的路径,尽管在战争背景下有其特殊的运行模式,但通过“合作社”的方式推进中国工业化发展,确实适应当时的国情,因此成效极其显著,缔造了中国工业化发展的一个卓有成效的历史阶段。这种具有过渡性质的工业化探索历程,一方面为中国当时的教育变革提供了产业发展需求,即需要千千万万具有新知识和新技术的生产者充实到“工合”的生产一线;另一方面也预示着革命成功后“新教育”发展的未来产业发展趋势。这对于认同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并以之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来说,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即将来临的工业化新世界对“新教育”的迫切要求。

艾黎在工合运动之初就意识到开展技术技能教育应当作为工合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确保工合运动得以成功和发展。当陶行知于1938年看到艾黎关于工业合作社

的计划时大加赞赏,认为此项运动除了使被难工友得到救济,国防工业得以建立之外,还有至为关键之处就是使其倡导推进的“工学团”运动得以有更为宏大的工业发展背景而同时并进。他说:“一年前,《中国之声》记者夫妇和我在纽约见面,并把艾黎先生的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计划书草案给我看,我详细的读了一遍,觉得这是建设国防工业的根本大计,很是高兴。”事实上,在陶行知看来,工合运动营造了推进中国工业发展的新契机,而这恰恰是“新教育”产生的背景。他认为“虽然艾黎先生的草稿及印出来的小册子里面的工合只具备了‘工’和一部分的‘团’的作用,而没有提到‘学’的作用,但是我相信这个运动开展的结果,必然的要把‘学’包括进去而成为一个工学团运动。”因此,在他看来,“如何把‘工’做得好,把‘合’团得好,都非大大的注重‘学’不行”。而事实上,工合运动很快就启动了职业教育实践,艾黎自己说:“1938年‘工合’刚刚兴办的時候,我们就意识到,在成立合作社的同时必须进行办社和技术方面的培训”。陶行知对此大加赞赏,他说:“我对于整个工合运动是抱着无限的希望。在我的心目中,它是一个伟大的生产运动,是一个伟大的教育运动,而且是一个伟大的社会运动”。

艾黎对于在“工合”运动进程中举办培养培训技术技能人才的学校抱有极大的热情。我们在他为延安“工合”设计整体方案并推进运动的进程中,就可以看到他对于建立和发展“青年技术学校”有巨大投入,而该校其实就是享誉甚高的延安自然科学学院。当时“为了对外宣传方便,自然科学学院对外宣传用青年技术学校”,该院是中共中央为了充分发挥1938年夏秋之际大批进入延安的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在技术领域的作用

而于1939年5月创办。但自然科学学院取得实质性进展则是在1940年艾黎将募集到的捐款带到延安作为启动资金以及艾黎与林伯渠等确定建院选址之后的事情。“自然科学学院的建设是在国际友人艾黎同志的大力资助下进行。……最初,他从南洋群岛募捐了一笔钱,开始拿出一千多元(美金),三百多元给‘工合’,一千多元给学校,解决了不少问题。艾黎同志的母亲,对艾黎的事业很支持,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很热心,当时已86岁高龄,在新西兰骑着脚踏车到处为支援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搞募捐……艾黎同志的母亲第一次送到延安的捐款记得是九千五百美金,用于办自然科学学院、光华农场……第二次送到延安的捐款大约是五千多美金”。党中央在当时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将艾黎及其母亲送到延安的捐款大部分给了自然科学学院。此外,艾黎还从香港和海外设法弄到了不少设备,有的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自然科学学院在办学方面分为初中部、高中部和大学部,“中学偏重实用技术的学习,大学注重精研学理与实际技术相配合”。自然科学学院是延安时期培养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的摇篮,其意义不止于促进延安的“工合”运动,更重要的是为新中国科技、工业发展培养一批早期的重要人才。

艾黎推动的“工合”运动被誉为“伟大的教育运动”,其主要体现是创办了一批“培黎”工艺学校。这些学校都是为普通的合作社徒工或逃难的工农子弟而设,围绕着合作社生产所需的技能,以半工半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培训,同时传播“工合”运动理念,以期对工合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1940年起,艾黎推进工合在全国的东南、西北、西南的四川开始试办培黎学校。

他之所以以“培黎”作为学校名称,也有其重要寓意。他说:“我选用‘培黎’这个名称,是为了纪念约瑟夫·贝利,一个从1891年起一直在美国的美国人。他主张我们这种培训办法,而且在美国很出名;我们曾从美国筹集到大量资助。再者,‘培黎’在中文里是‘为黎明而培训’的意思,我们认为这样命名很合适。”第一所培黎学校在江西赣县创办,6个月后停办,此外,在广西桂林、湖北老河口、甘肃兰州和河南洛阳等地分别建设了培黎学校。1940年初,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艾黎在陕西双石铺建立了一个机器合作社和一所培训学校,即“陕西双石铺培黎工艺学校”。除双石铺学校外,其余学校均在举办一段时间后因种种原因停办。1944年12月,双石铺学校正式迁址至陕西山丹,成为著名的“山丹培黎学校”。

艾黎在山丹培黎学校的教育实践有其鲜明特色。第一,面向人人,向人民敞开学校大门。学校学生几乎全是战争孤儿、难童和贫苦的工农子弟。艾黎指出,山丹培黎的实践证明,正因为从小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使普通农民的孩子具有很大的潜在力,其智力和能力要强得多。他说:“那些被抛弃在路边的赤裸、饥饿的难民孤儿,那些文盲父母生的文盲孩子,可以培训成为出色的技术人员和能干的行政人员。”学校广泛接收学生,在校学生最多时有来自全国17个省和甘肃19个县的500多人。艾黎就是要证明出身和条件不好的受教育者同样可以被培养成为优秀的人才,这是他试图改造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提倡合作和创造,培育真正能够服务社会的新人。双石铺培黎在创办之初,就确定办学宗旨为“培植青年合作社员的服务精神,启发其向上意志,提高生产技能,增

进合作知识”。一方面要让学生在实际的生产生活中,养成合作的精神,另一方面要具备娴熟的技术,能够为合作建设贡献力量。因此,在教育教学中,广泛地使用教学做合一的方法,师生关系要融为一体、打成一片,真正培养学生自管、被管和管人的能力。

到了山丹,艾黎确定校训为“创造、分析”并镌刻于石。这更是一种全新的教育实践理念,旨在教育学生不仅要获得书本知识,而且要具有生产的实践经验,能够自己进行分析和创造,这正是要让学生们达到引领时代、推动进步的效果。

第三,坚持半工半读、理论联系实际,培养一流的技术技能人才。山丹培黎在艾黎的领导下,落实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基本意旨,实施真正的半工半读教育模式。学生所学课程比较复杂,其内容不仅立足当下,还指向工合运动的未来。“他们的学术水平一般说是很高的,尤其是英语知识方面,比之于国内最好的大学毕业生,毫无逊色……他们经常研读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等等与他们所用的机器有关的知识,以及西洋科学的发展情形……学校还教他们怎样用西洋会计法应用到中国账本上去。此外,对于合作原理,及它的基本哲学,亦是他们主要的功课”。之所以有这样的课程设置,因为艾黎认为他们的学生不仅将为中国农村工业服务,可能整个亚洲的工业化都需要他们,因此要富有远见而为未来育人。

与此同时,艾黎大力推进山丹培黎建设起供学生半工半读实习的各种生产场所。建成机械、纺织、电器、化工、陶瓷、玻璃、皮革、造纸、煤窑、汽车运输、农业、畜牧、垦荒、地质勘探、测量、地下水利用工程和医院、副食品作坊、小型糖厂等20多个生产车间和实训基地,此外,还有机械加工设备27台、

动力设备47台、大型卡车30部、20张病床和X光机等配套医疗设备。在那个时代,这样真实有效的半工半读学校教育体系,在世界范围内也实属罕见。

为了更好地强化教育与生产的融合,山丹培校与当时存在的若干乡村工业示范组建立协作关系,“创办各项乡村工业,由该组供应机具经费,初期注重技术实验及训练,一俟生产达于自给自足,将逐渐改为合作经营”。通过产教融合,依赖学校技术实现真实性生产和经营的目的,足以证明当时山丹培校师生有较高的技术运用水平。事实上,山丹培校长期聘请20余位外籍教师授课,还曾送学生到海外实习实训,持续保持较高的办学质量。

艾黎在山丹培校艰苦卓绝、热忱投入。当时,中国航空工业先驱王士倬在考察完学校后,为艾黎的艰辛付出和崇高理想而感动。他描述道:“他穿着草鞋,每天在甘肃省最穷苦的一个地方‘山丹’,吃灰色的馍馍和白薯,没有肉。步行二十华里,对于六十多岁的艾黎,是日常之事。他是教育家,培黎学校的校长。他是外国人,籍贯纽西兰。他对于中国的工业合作协助,怀抱着无限热忱与无匹的勇气,要替乡村工业开辟一条生路。”艾黎在山丹办学的艰苦与不易跃然纸上,让我们看到这位教育家为中国的事业而“不改其乐”的境界与精神。

四

艾黎被誉为“工合之父”,在其推行“工合”教育和举办培黎工艺学校的进程中,不断地形成具有引领时代发展和推动中国职业教育转型发展的较为系统的职教思想体系。

(一)立足中国国情强调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性

在艾黎看来,推动和落实合作社的发展,不能离开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和培训。早在1938年“工合”刚刚兴办的時候,他就清醒地意识到,成立和推动合作社的同时必须进行办社和技术方面的培训。在他看来,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地域广袤,只有通过实践性的技术教育,学员掌握多种生产技能和管理方法,才使适应各地不同的特点和需求。他说:“随着合作社的发展,我越来越认为该做的事是搞出一套培养内地工业合作社领导人的办法来,并且网罗能做这种工作的人才,把他们放到贫穷落后的地方去,让他们熟悉当地的条件,并学会处理问题,他们应受到多方面的教育,从而能创造性地满足以后的年代可能出现的任何新的要求”。因此,艾黎的推动技术技能教育的出发点是为了辅助工合运动,有着明确的指向,是面向未来的工合的创造性发展。

艾黎重视技术技能教育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立足于中国农村、农民的发展,他深刻地意识到这种教育是解决上述发展问题的重要举措。通过技术技能教育使中国农村老百姓与现代工业结合起来,这其实是符合现代中国的发展路径。他说:“在山丹办学试验的目的是要更好地将工合工作发展到内地农村,帮助老百姓提高自己的水平,使他们与即将兴起的工业化中国融为一体”。当时,工合的同仁们也非常明白艾黎倾心于山丹培黎学校是有其深远的目标和用意的,他们认为艾黎在为其信念奋斗,即“埋首西北边僻的山丹主持培黎学校,其惟一的目标想为中国培养一批能手脑并用的新的干部,来负担建设新中国的一部分

责任,这种理想粗看似未免过于迂远,难期速效。然他能舍身为事业的精神与始终一贯的意志,值得我们从事工合的同人钦佩效法的”。艾黎的远见既具有时代眼光,也体现了他对中国共产党必定会开辟一个新世界有着执着的信念。“他期待着有一个新秩序的出现,并致力于培养能够在此基础上帮助建设新中国的年轻人。他特别认为,工业的发展与乡村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大规模工业的发展之外,还能发挥作用”。因此,他的全部努力都在为未来的新中国成立与发展而不懈地进行着。

艾黎在新中国成立后,看到中国的发展趋势,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发的大国,青年人不可能都住在城里寻找电子计算机或实验室的研究工作,必须有众多的人到农村去,为人民创造新的美好生活。”事实上,中国的乡村教育一方面需要为农民提供生产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还要为那些希望在乡村创业的人提供技术技能教育的支撑,实现人才向乡村的流动才是真正有出路的乡村教育,这一点,艾黎有着先见之明,这也是他回顾与总结自己毕生的教育经验,写成《探索创造性教育纪实》这本教育著作的真实用心。

(二)立足马克思主义倡导“求知生产不相离”的教育原则

艾黎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过深入地学习和研究,20世纪20年代他来到上海后即参加了国际性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他思索并接触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逐步认识到这个旧制度必须要推翻”。之后,他不间断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且最终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艾黎的教育思想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

他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从工厂制度中萌发了未来教育的幼芽的思想,也就是未来教育体现为生产劳动同智育、体育相结合来提高社会生产和造就全面发展的人有着深刻的体悟和认同。他沿着马克思的思想轨迹不断探索,将发挥人的潜在才能和通过实际工作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和管理能力作为其教育的重要方向。

第一,艾黎强调接受教育是人成长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而人的成长从本质上就体现为不断进行着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动手与动脑相结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始终结合在一起,既是人受教育的结果,也是人成长的结果。这种思想与他对知识本质的认识有关,他认为就知识的总体来说,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基于这种认识论和知识观,他在其著作《探索创造性教育纪实》一书的前言里对于人的教育进行了形象的比喻:“培养青年正像培育一粒籽种发出两片子叶一样,人们不可能先培育出一片子叶,然后再培育出另一片子叶。教育青年要像培育籽种发出两片子叶一样,必须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劳动实践,手脑并用,使两片子叶同时展开,让幼小的禾苗正常发育,茁壮成长。”

在这种哲学和价值观的基础上,他把人的教育目标界定为培养有实践技能和创造精神的人才,他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唤醒青少年的创造性,培养他们对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创造性的教育,对学生说,应当教育他们是什么,还要教育学生为什么,要学生会提问,会追根求源,培养学生的分析思维能力”。艾黎提倡教师要用启发的办法,给学生打开思路,鼓励学生自己沿着指示的方向前进,而不是牵着他的鼻子,强迫他走,压抑他的自信心。要循循善诱,让学生

自己思考,产生向上的意志和精神,不必多由教师代劳而求其通达。

在他看来,“劳动创造了人,人的大脑和手的劳动,创造着世界。因此,教育要按照这个原理,做到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做到手脑并用,协调发展,不可偏废”。因此,在具体教育教学中,应当探索创造性教育,在教学方法上,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手脑并用,让学生学会分析,具有创造性。

第二,艾黎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教育教学中应当体现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总结了在山丹举办培黎工艺学校时的办学经验:“我们在山丹发现了为普通农民建立一个理论和实践适当平衡的教育中心的办法,理论必须和实践相结合,不只是偶尔结合,或相隔很长一段时间才结合,而是每日每时都结合。一个正在成长的学生,如果要成为社会上迫切需要的人才,必须每天都参加实际工作,不经常实践,理论是学不好的,教育也是不全面的”。他深刻地意识到针对普通农民进行技术技能培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必须适应其生产和生活的需求,要坚持进行常态化的结合,从真实的任务或工作出发来进行理论学习和技能传授。

在理论教育方面,他认为迫切需要传授的首先是技术理论,也就是应用型的知识,而不是学术性理论。这就要求教师应当像工艺师傅一样,既教学生必要的理论知识,又能动手示范技术教学和一专多能。

艾黎“求知生产不相离”的教育思想和作法,既适应了当时“工合”事业发展中对技术技能人才的培训需求,也将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教育发展思想切实地在中国大地上进行了实践,这对于时代巨变下,中国在抵御外敌入侵的危难时刻不断进行后发

式发展和明确教育改革道路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第三,艾黎推崇劳动和学习同步进行的教学方法。他认为学习的结果转化劳动的成果,就使得学习产生了即时的价值,能够使学生引发对学习价值的认同和思考。他深刻指出:“劳动和学习必须同时并进,这叫做手脑并用。通过自己的劳动生产 outcomes 来,每件东西都和使用价值联系起来思考,这是一种效果良好的教学方法。”

他对劳动与学习关系的认识并不同于简单地使学习过程变成为劳动的过程,而是要让两者有机地结合。这种结合是学习不断地向劳动成果的转变,是对学习价值体现在劳动价值上的认同,这是对劳动与学习内在关联的深层次解读。对于我们今天提倡和推进劳动教育同样具有重要启迪。

(三)立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推进合作精神的培育

艾黎全力倡导的“工合”理念,既重视通过技术培训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将技术与生产相结合,充分发挥其实用性的方面,也特别重视技术培训导致的人与人之间产生的互助性,以及因互助而进一步生发出来的使中华民族在面对外敌入侵的危险时候得以战胜敌人、永续发展的民主理想、乐观精神和合作能力,这也是对“工合”倡导的“Work Together”“一起干、努力干”精神的最好诠释。因此,在艾黎的视野中,通过合作社要为身处在任何地方的中国人民提供平等参与合作、共同创造财富的机会,同时,也能够为他们提供受教育可能,从而为这些人进行自主与创造的生产生活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可以说,艾黎提倡的这种立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合作精神”,就是一种持续构建中华民族内部“命运共同体”

的尝试。

第一,艾黎培育合作精神的思想是针对当时中国经济生产模式进行重构和发展的迫切需要。当时,中国民族资本和工业生产虽然经历了大发展,但近代工业化进程被日本的入侵阻断,面对占比巨大的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等前工业生产模式,工业合作社既是保护已有大工业生产由大城市转移到腹地开展的方式,也是推动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生产适应工业社会需求进行的大范围的重组和重构。“‘合作生产’的口号不仅适合于保护合作社的成员,而且适合于全体合作社有计划地合作生产相关的产品。他们将会知道,根据计划原则的标准化生产,并不排斥个人的积极性、工艺上的精益求精和民主管理”。通过教育培育合作互助精神,恰好就是为了适应经济制度、生产方式的巨大变化,既是应战时生产之需,也是面向未来发展之需,这是具有时代意义的教育变革。

艾黎的合作教育思想中还浸透着爱的教育理念。他强调为人需要回馈社会,并以此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人生目标。因之学校及教师应当坚定地建立“以人为本、爱生如子”的教育观念,要让学生作学校的主人,要从小给学生委以“重任”,以培育适应社会变革的、具有坚实的群体观念且能够担当时代重任的

具有合作精神的主人。

第二,艾黎相信中国人民的力量,对于通过教育使人们形成合作互助的精神和能力充满信心。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他认清了国民政府的本质是追求私利,而对于边区则充满期待和希望。他清楚地看到,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效地推进了合作社的工作。正如埃德加·斯诺所说:“艾黎越多看见这个惊人的民族的勇敢和多谋,就越相信一种激发他们惊人的复元力量的民众运动的健全性。”边区合作社及其教育的成功,使他更加深信培育合作精神的教育具有深远的价值和意义。

路易·艾黎作为一名外国人,抱着对中国无比深厚的热爱之情,联合和发动国际力量共同支持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而其自身也以勤苦无比的状态投身于各项助益于中国独立和发展的经济和教育工作中,既以其推动中国工业发展的卓越贡献而享誉海内外,又因其提出系统前瞻的职业教育思想而影响新时代。时至今日,我们在缅怀其无私奉献的同时,应当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挖掘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职业教育百年发展进程所贡献的思想和精神财富。

(本文来源于《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1.6.7)

习近平向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8月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对促进就业创业、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积极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支持中外职业教育交流合作。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加强互学互鉴、共建共享,

携手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为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力量。

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当日在天津开幕,主题为“后疫情时代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新变化、新方式、新技能”,由教育部、天津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稿件来源于新华网 2022.8.19)

关于新西兰友人艾启赫的史料(二)

编者按:上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初,先后有来自8个国家的30名外国专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护士来山丹培黎学校任教和工作。艾黎在自传中写道:“除了始终存在的财政困难之外,我们还发现,要想动员中国教师去荒凉的西北工作是十分困难的。我们学校虽也有中国教师,但如果没有约30位来自8个国家的外籍教师的协助,学校是办不好的。这些外籍教师在不同时期是由不同的国际组织派来的。有些时候,我们感到走投无路了,接着障碍被克服了,外援来了,学校才得以继续办下去。何克接办双石铺的培黎学校之后,设法请来在公谊服务会派到中国工作的恩迪·布雷德和罗伯特·纽威尔来协助工作,在山丹招聘后勤工作人员就更困难。公谊服务会又一次帮忙,派新西兰会计师考特尼·阿切尔(艾启赫)来协助。考特尼的事业心很强,他建立起学校的财会制度,还培养了一名工作人员。”除了艾黎、何克外,这些外籍教师的史料非常罕见。工合运动研究学者秦泉安先生翻译、整理了4份有关艾启赫的珍贵资料并发来本刊,现刊发第二部分,以飨读者。

《让人们拥护他》(Let the People Have Him):新加坡政治名人詹时中传记中有关詹时中先生早期在新西兰留学期间与艾启赫相关的章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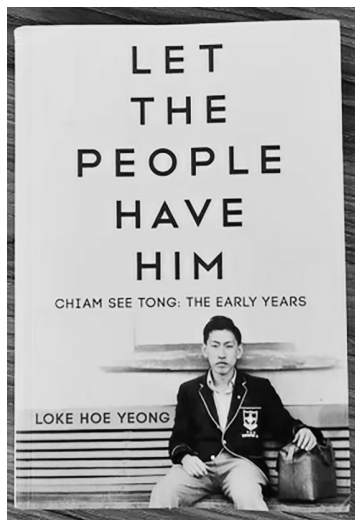
詹时中的早期生活

1955年,CHIAM SEE TONG(詹时中;新加坡波东巴西区议员,新加坡人民党总书记)在ACS完成了他的大专教育,他的父亲想让他上大学里主修理科,就像他的

哥哥Joon TONG一样,大詹时中的父亲(老詹先生)把他大儿子Joon TONG送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学习化学工程,希望他能帮助他经营一家橡胶企业。其大儿子(JoonTONG)在那里做得很好,完成了他在那所大学的荣誉、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有资格考入剑桥大学,但更喜欢曼彻斯特大学,因为它的课程比较实用。然而,当他毕业时,他并没有进入他父亲的公司,而是在英荷石油公司壳牌工作。

看到他在学校里对科学从来没有多少好感,尤其害怕化学。因为在这门学科中他必须学会如何处理的抽象方程式。作为一个顺从的儿子,他像上中学时一样听从父亲的吩咐,并还是服从父亲的安排到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大学(Christchurch)攻读理科学位。

对于一个富裕的受英语教育的家庭来说,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大英帝国的另一个王国深造是一个自然的选择。



Chiam Heng Hong 先生家族的生意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超越战争)期间表现得相当好,尤其是他从事的橡胶交易在美国及其盟国的战争努力中有极大的需求。

当战争结束,欧洲从二战中恢复过来的时候,詹先生的家族生意略有下降。所以,虽然他提供了一些经济上的支持,让他的儿子詹时中在国外学习,但他希望他的儿子能在假期里挣钱养活他。

1956年,詹时中前往新西兰,他的父亲为他预订了一个座位,基本上是一艘牲畜船,有一些乘客座位。因为是一艘小船,所

以看到他到西澳大利亚的弗里曼特尔的一周航程是艰难的。船上所有的乘客都晕船,不停地呕吐。他们很不舒服。

船上提供的食物很丰盛,但是很油腻,所以对詹时中来说不是很好吃。尽管如此,他还是很享受第一次离开新加坡的旅程。船上有些旅行经验丰富的澳大利亚旅客组织了一些游戏,希望能让这次旅行尽可能地愉快。只要花两英镑,乘客就可以参加像投掷马蹄铁这样的比赛,詹时中很擅长这种运动。

他在航行中组织的旅途比赛赢得了一个马克杯——这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东西,但他非常珍视它,多年后还可以继续放在他的卧室里。

在顺利结束航程并抵达弗里曼特尔后,所有的乘客都松了一口气,因为旅程终于结束了。一个鲁莽的新加坡男孩自始至终自吹自擂,说他可以勇敢地度过任何崎岖的航程。然而,由于船停靠在弗里曼特尔,他再也忍受不了了。

他呕吐得太厉害了,不得不用担架把他从码头抬到医院去。詹时中乘坐火车从邻近的城市珀斯到阿德莱德。

在穿越维多利亚大沙漠的那三天里,他除了从窗户上看到红土外,什么也没看到。另一次火车旅行把他带到了悉尼。在那里他乘渡轮去了新西兰的奥克兰。他乘火车和渡船一直南下,直到到达他即将开始本科学习的城市。

在克赖斯特彻奇,詹时中认识了一群来自中文中学的6名新加坡学生。他们是中文高中和天主教高中里最聪明的学生,他们获得了英国殖民政府颁发的著名的科伦坡

计划奖学金到新西兰学习。他们和詹时中住在同一套公寓里,还去了克赖斯特彻奇大学(Christchurch)学习数学和科学等学科。

受华文教育的学生在数学等科目上成绩优异,但他们的英语说写不如他们的母语流利。而詹时中的情况正好相反,所以他们相处得很好,在功课上互相帮助。在课余时间,学生们还会邀请詹时中一起去看电影。他们最喜欢的影片是以革命和共产主义为主题的影片,这些影片在新西兰免费提供,但在英国控制的马来亚(新加坡)被禁止上映,原因与共产党在紧急状态下的叛乱有关。詹时中以前从未接触过这种类型的电影,甚至没有接触过华语电影,他对它们非常着迷。

“我以前曾被西方电影“灌输”——约翰·韦恩和加里·库珀的西部电影”,詹时中总是回忆道。

“在我小时候看过的那些电影中,中国人总是土匪。中国人被描绘成吸食鸦片和洗衣的人。白人被认为是更优秀的人。但在这些中国革命电影中,中国人是英雄,在战争中与日本人作战。我开始钦佩中国人民及他们所展现的勇气,这让我大开眼界。我的普通话很差。否则,我本来可以更喜欢那些电影的。”

中国学生还向詹时中介绍了中国音乐。他们会在留声机上听中国歌曲的录音,从革命歌曲到传说中的上海女歌手周璇(ChouHsuan)的歌曲,不一而足。

与艾启赫的相识

让他对有关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兴趣得以使他与当地一家新西兰人面粉厂老板考特尼·阿切尔(中

文名:艾启赫)有了见面和相识的机会。

艾启赫(英文名 Courtney Archer)在基督城大学结识了许多中国学生,包括来自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学生,并帮助他们成为新西兰人的朋友。通过与马来亚华人学生的相互认识,艾启赫了解到一个有趣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詹时中(Chiam See Tong),来自新加坡。他被其他人告知说,这个学生总是会和他们一起去看电影,但他并不像他们那样有中文中学的背景。有一天,艾启赫开车到大学校园去找詹时中聊天,他是通过詹时中在克赖斯特彻奇参加的教堂的牧师找到他的。

是艾启赫此后成为第一个让詹时中对政治感兴趣的,并逐步引导他热衷于政治并最终投身于政治。



艾启赫先生一生热爱中国和中国文化。作为一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登记为出于良心拒服兵役者,这让他的父亲感到惊愕。为了将他的和平主义理想付诸实践,年轻的艾启赫自愿帮助管理流动医疗队,并将医疗用品运送到偏僻的医院。

艾启赫最终被派往中国西南部农村的一家医院,在那里他是一名实习麻醉师。通过与中国同事的接触,他开始沉浸于所有的中国事物中——从艺术到历史再到语言。

正如艾启赫后来对周围朋友所说,这些经历“扭转了他的生活。”他的经历导致了“对中国、中国人民,以及中国历史的无尽而持续的好奇,这种好奇心似乎从未停止过。”

他刚好在此期间有机会前往中国西北部的甘肃山丹培黎学校时进行访问。这所学校是由艾启赫的新西兰同胞路易·艾黎(Rewi Alley)创办的,它的办学理念是为中国的农村男孩和女孩提供“半工半读”的教育,否则这些男孩和女孩就不会识字。他们在学校里还负责教授诸如机械操作等实用技能,并结合英语课程,以使得参加学习的每一个学生发展成经过培训的熟练技术人员,艾启赫同时还负责教授英语,并担任艾黎校长的财务管理员和助理。

艾启赫先生在山丹培黎学校度过了一段创奇并有意义的时光,而此时也恰逢中国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共两党间因为抗战的共同目标所形成的暂时的同盟破裂,双方的战斗全面爆发。

直到1949年10月1日,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遥远的甘肃山丹的周围,几方战斗仍在激烈进行。虽然艾启赫等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但他们在暗地里同情中国共产党。他认为共产党人真正致力于改善同胞的命运。

随着共产党巩固了对中国的控制,主要来自西方的国际组织开始停止对中国的财政支持。山丹培黎学校因此遭受了共产党对学校经营施加的政治压力,甚至造成部分学校的教职工和学生收到来自不同方向的袭击。作为外国人,艾黎和艾启赫等还在学校坚持工作的少量外国人受到中国新统治者及其追随者的怀疑。这也导致了艾启赫

对毛泽东的战术越来越反感。

1952年,艾启赫不得不做出返回新西兰的痛苦决定。他的父亲因为健康不佳将不久于世,家族需要他尽快回家来接管他家在克赖斯特彻奇郊区兰吉奥拉的家庭面粉厂生意。正如艾启赫后来给关心他的朋友们所解释时所说:“孝顺胜出了”。父亲去世后,他不情愿地回到了家乡,成为了H.Archer & Sons面粉加工厂的董事总经理。

就像艾启赫在中国西北地区与艾黎一道工作、共同相处的经历改变了他的生活态度一样。艾启赫与詹时中在此期间的接触也改变了这位年轻新加坡人的世界观。因为艾启赫曾与这位年轻的新加坡学生接触,因为他是一位渴望讨论中国文化、建筑和艺术的老朋友。詹时中告诉他,“但是艾启赫先生,恐怕我对此了解不多!”艾启赫先生和詹时中对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了解有限,以及他对汉语的迟迟不掌握感到惊讶。

艾启赫本以为所有的新加坡华人都会精通这些,然后詹时中向他解释了他的家庭的英国化背景。反过来,詹时中对于像艾启赫这样与克赖斯特彻奇的生活毫无共同之处的国家和文明的深切的兴趣感到惊讶。尽管如此,两人从一开始就相处得很好。正是这种对对方背景的兴趣,最终成为此后40多年间他们两人所拥有的交流和交往提供了很多素材。

艾启赫总会在周末在他位于Rangiora家中为这些来自马来亚/新加坡的华裔学生安排社交聚会。他们会一起准备中餐,然后用下午的时间在艾启赫家的花园里讨论中国的文化和政治,那里装饰着中式的亭台楼阁和池塘上的桥。就像中国画中描绘的古典

园林一样。

在社交方面,艾启赫和詹时中相处得比其他中国学生好。这主要是因为詹时中比其他一起来的朋友们更精通英语,所以艾启赫先生可以与詹时中在交谈沟通方面更直接、顺畅和做得更久。

热衷思考政治问题

艾启赫会向詹时中及其朋友们介绍他在中国居住生活的六七年间的经历,分享他结识并与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等当时政治名人的相处和工作等难忘的经历。他还想詹时中他们介绍了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语录》。

詹时中对于艾启赫的介绍、经历以及这些名人的故事,特别是对《毛主席语录》非常感兴趣,甚至立即出发在克赖斯特彻奇当地的一家书店设法买到一本《毛主席语录》。这本书当时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是属于禁书。

“这是真正的民主。”詹时中在提到他在新西兰遇到的思想和出版物的自由流动时说。“我还买了所有可用的共产主义材料,并亲自阅读。”

与艾启赫和詹时中在一起,这些中文学生会经常辩论和谈论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教导。对他们来说,社会问题和经济总是从毛泽东主义的角度进行争论。他们毫不掩饰地同情中国共产党人。考虑到中国大部分地区极度贫困的情况,他们争论共产党的政治理想是否是一种正义的力量。

他们把当时的詹时中引入到政治意识形态的讨论中,詹成为所有政治问题的新手和热衷者。他们在新加坡上华文中学的时光把他们塑造成了这种模式。然而,后来进入反对党政坛的只有詹时中独树一帜,成为

榜样,而其他许多人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公务员队伍中度过的。

詹时中还对新西兰的政治——福利国家体系和支持它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感兴趣。大家周知,“新西兰是一个工人和专业人员在社会和经济上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詹时中后来也对此进行过反思。他试图从艾启赫和其他人那里了解更多关于新西兰福利国家体系的知识。

当时,与英国殖民局就新加坡当局更多自治权力的谈判仍在进行。对他来说,在一个日益自治的新加坡,全民医疗和公共住房补贴是非常需要的。考虑到他受庇护的成长环境,这些谈话的效果是让詹时中更加认真地思考新加坡的社会现实,以及可以做什么来解决这些问题。

20世纪50年代,国际劳工组织将新西兰列为福利国家典范。它已经成为公共和社会政策最进步的国家之一,尤其是1893年成为现代世界第一个赋予妇女选举权的国家。

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战后婴儿潮开始,由两个主要政党组成的连续几届新西兰政府都确保了低失业率和高生活水平,其特点是慷慨的国家住房。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关键立法导致了较高的住房拥有率,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预先支付的家庭福利,并将其作为住房存款加以资本化。

它不是一个放任自流的福利国家,因为一些人后来会批评新西兰的制度,因为福利国家在1980年代被撤销,90年代关于福利国家的利弊的复杂辩论早在1950年代就已经很明显了;人们认识到,国家福利只能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发挥如此大的作用,而不

会滋生经济和社会上不可持续的依赖态度。

新西兰的经济是通过与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同胞的贸易而繁荣起来的。许多来自英国的移民来到新西兰,使新西兰的人口达到200万。当欧洲经济复苏时,新西兰的人口略有下降。

当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时,英国对从新西兰进口的农产品的依赖减少了。

艾启赫与詹时中两人之间的友谊一直持续到艾启赫先生于2002年去世。在这40年期间,艾启赫和詹时中一直保持交往,他们之间和多次拜访对方的家。

在20世纪70年代末,当艾启赫闻知詹时中已经进入政界并开始从事政治时,他简直不敢相信。他深知詹时中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热情,但认为他对政治的混乱太热心了。詹时中并不是像一些新西兰政客那样冷酷无情的政治动物,而艾启赫本人就这些人有自己的看法和认识。

此外,艾启赫还意识到,作为新加坡反对派政客面临的风险非常大,特别是在上世纪70年代,当时议会中没有明显或突出的反对派政客。但当他在1984年听说詹时中在新加坡的波东巴西区(Potong Pasir)的选举中获胜时,艾启赫还是第一时间对他的老朋友充满了钦佩。

詹时中在新西兰求学期间,每年都要利用整个暑假工作长达三个月之久,因为他不想从他父亲那里接受任何额外的经济支持。

在他整个留学新西兰期间,他甚至没有一次返回新加坡探亲,因为往返新加坡需要花一大笔金钱。他认识通过短期工作也是度过空闲假期的理想方式,他最早找到工作的地方之一是一家冷冻工厂,在那里,牛被宰杀

和冷冻。他在那里一个仓库里的任务是不断地清除通过水闸处理的冷冻动物血液颗粒。这些被用作肥料的颗粒,很快就通过了水闸,“就像打了一场失败的战斗!”詹时中在后来的回忆这样说道。那是艰苦的工作,这个地方臭气熏天。他几天后就放弃了。

接下来,他和一个朋友一起找了一份在田里摘土豆的户外工作。这同样也是更艰苦的工作。当地的毛利人身材魁梧,她们与她们一起工作,轻松地完成任务,她们的体型比她们大。他很快就放弃了那份工作。

据说,詹时中最喜欢的是在当地的饼干厂的工作,在那里他把面团放进一个滚筒,把饼干准备成适合烘焙的形状。工作之余,他还可以得到了免费的饼干作为奖励,供他自己食用。另一项任务是将大块猪油喂入铡刀之中,锋利的铡刀很快就将猪油与面粉混合制成饼干。

暑假期间的周末,詹时中还和其他朋友们去码头工作,从进港的船上卸货。他们必须加入工会才能在码头工作。因为工会的影响很大,所以每当下雨的时候,所有的码头工人都被要求停止工作,躲避到附近的一个历史庇护所,所以即使是在下着毛毛雨的时候,他们在庇护所休息的时候仍然可以得到一整天的工资。

有时,詹时中甚至会帮助他的朋友们工作,部分原因是当他感到无聊时的消遣。比如说,他有一个马来亚朋友,他承担着在仓库当守夜人的工作。他的朋友还养着一条杜宾犬,有狗可以陪伴他度过寂寞的长夜,但有一次,这只杜宾犬曾经把他吓呆了,于是他更愿意请詹时中也经常过来陪着他。詹时中后来才发现,这只杜宾犬实际上是在黑夜里照顾

那个朋友的,这让他觉得很有趣。

詹时中在克赖斯特彻奇留学期间,他从朋友身上学到了很多,尤其是通过他们对他的社会和政治意识的觉醒。然而,他在大学里的表现远非一流。

他在理科方面很吃力,这与他在新加坡上学时遇到的情况一样,他选择在中学学习理科只是为了取悦他的父亲。他在大学里最可怕的时光是考试期间。

其实,真正说到学业,詹时中在克赖斯特彻奇大学的课程成绩不佳,不得不重修一年。最后,他决定转学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Wellington),这让他能够重新学习一些他毕业所必需的核心模块。

他在新西兰首都的留学期间,他开始对羽毛球重新产生了热情。在ACS,他投入了大量的业余时间作为学校游泳运动员的训练,但他也有多年的练习羽毛球在网球场他的圣托马斯步行回家。他多次代表学校参加校际运动会,并获得大学蓝色奖,这是学生在体育方面的最高奖项。

还有一个人叫 MokKumFun(后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在惠灵顿大学与詹时中同期上学时就与他相互认识。他认为,这个时候詹时中已经开始对社会问题和政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与他在克赖斯特彻奇的工作相比,詹时中表现出了更大的决心和毅力,无论是在运动还是在学习上。令詹时中可以松一口气的是,1961年,他在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Wellington)完成了他的课程,获得了理学学士学位。

更重要的是,他开始形成了深刻的社会意识。他对如何应对社会问题的想法还

不太成熟,但他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可逆转的社会政治参与之路。当 Chiam 最终回到新加坡时,他的父母惊讶于他们的儿子在这期间长得有多高。



《詹时中传记》一书背面的所刊登的詹时中的照片

新西兰实际上是一个流着牛奶和蜂蜜的国家,而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在英格兰仍然遵守着食品配给。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欧洲投下了长长的阴影。

从新西兰回来后不久,(他的表弟)Lawrence 在家中见到了詹时中。詹时中记得他的表弟对他说,“你知道新加坡有多贫困吗?我们似乎并不担心。”Lawrence 认为詹时中在新加坡而不是在新西兰的时候得到这样的启示是令人惊讶的。

新西兰可能不会比新加坡更贫穷,但正是在那里,詹时中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人生观。通过接触他在克赖斯特彻奇的朋友艾启赫和那里来自中文中学的新加坡学生,他对最终会导致他进入政界的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变得敏感起来。

(作者秦泉安系路易·艾黎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西安培华学院西北工合研究所所长)

毛泽东和中国工合运动

编者按: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中的1938年,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成功典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晶,也是中国成立最早,具有经济性、统战性、国际性、综合性的全国性社会组织。中国工合的历史性贡献,得到了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与高度赞扬。



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中国工合两位主要创始人斯诺(右三)、艾黎(右二)和马海德(右一)

1938年8月5日,由国际友人易·艾黎、埃德加·斯诺夫妇以及众多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发起,由宋庆龄同志作担保人、国共两党高层要员参与组建领导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成立。它是在抗战危急关头、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秋而生的群众性生产救亡运动,以“建设经济国防,支持长期抗战,发展民

族工业,实行民生主义”为使命,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振兴经济、救国救民的共同愿望,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群众运动,得到了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蒋介石、宋美龄先后任名誉理事长,孔祥熙、宋子文先后任理事长。国民党方面王世杰、邵力子、翁文灏、蒋廷黻、杭立武、张治中、俞鸿钧等,共产党方面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等,各界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黄炎培、朱学范、胡愈之、沙千里、卢广绵、莫德惠、陈文渊等都参与了中国工合的组建与领导工作。

毛泽东主席对工合运动表现出极大热情。当“工合”运动发轫之时,斯诺曾致信毛泽东,对“工合”作了全面的介绍,于是毛泽东和边区的其他领导人便开始注意到“工合”这一新生事物。1939年在延安召开的生产会议上,不仅采纳了中国“工合”协会的有关章程,还决定在延安建立一个“工合”指导站,并开始进行筹备工作。



艾黎(左一)在延安工合办事处的窑洞外留影

路易·艾黎是工合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毛泽东于1939至1940年曾三次在延安接见他。1939年2月,路易·艾黎首次访问延安时,受到毛泽东的亲切会见,毛泽东对艾黎所从事的工合事业很感兴趣,并给予积极的支持,后来艾黎向林伯渠、曹力如提议在延安设立工合事务所,并积极协助时任边区银行行长的曹菊如进行筹备。3月26日,经当时负责中央财经领导工作的李富春的批准,工合延安事务所正式成立。边区银行行长曹菊如任延安工合事务所的主任,边区政府建设厅工矿科科长孙齐东主持日常工作,工合发给延安事务所投资资金2万元(法币)和开办费1500元(法币),每月拨给300元(法币)办公,(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三编)[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这样延安工合就初步开展起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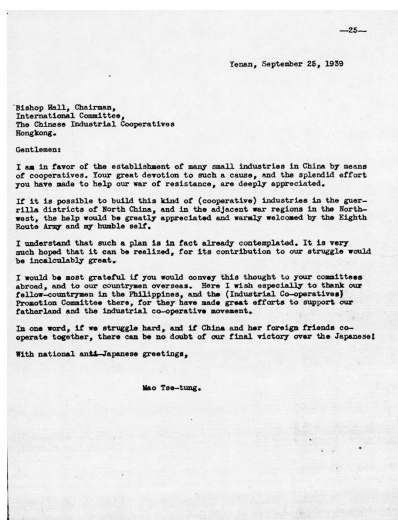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接见中国工合创始人之一斯诺

1939年9月23日,斯诺以工合代表的身份前来延安,对延安事务所的工作给予指导,并对陕甘宁边区进行采访。毛泽东在听取斯诺关于工合运动的发起、工合国际委员会的组成以及海外资金筹备委员会等项情况汇报后,发表谈话表示:

“中国工合纵使在前线地区和敌后游击地区无所作为,在帮助恢复我们后方的工业方面它们所做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工合在敌后战区最为需要,而且得到我们的军队、人民和政府的最热烈的欢迎,我们用这种方法可以达到几层目的:1)阻止敌货从被占领区向游击战争农村根据地的渗透;2)利用中国的原料和资源为我们自己的工业服务,防止日本之掠夺;3)创立游击战争经济上自给自足的根据地,以支持持久战;4)培训失业人员和不熟练劳工,使日本不能利用他们来反对我们;5)供应农民以所需的工业品来交换粮食,维持农村的繁荣。”(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斯诺文集》,第一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285页。)

时任边区政府建设厅厅长刘景范回忆说,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进一步“完善了艾黎提出的与边府建设厅合作科合作,推动各种合作事业,为生产、边防、医药、消费、信用、供给服务等工合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并推动他们一步一步在延安的发展。”(张志强.“工合”延安事务所[M]. 延安文史资料:第三辑,1986.)

1939年9月25日,毛泽东主席专门致函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何明华先生,对该会在帮助中国抗战方面所取得的光辉成就深表感佩,并热情欢迎“在华北游击区和西北接近战区的地方组织建立这种工业合作社”。



毛泽东主席致何明华的感谢信(英文版)

毛泽东主席致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何明华的信

香港，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
陈翰笙干事转工合国际委员会
主席何明华主教
诸位先生：
我赞成以合作社的方式在中国组织建设许多小型工业，对于你在这一事业上的热心，以及你在帮助我们抗战上所取得的光辉成绩深表感谢。
如能在华北前市区和西北接近战区的地方组织建立这种工业合作社，八路军和鄙人自己对这种援助将表示极大的赞赏和热情的欢迎。
我了解到这一计划实际上已在拟议之中。极为希望其能够实现，因为这对于我们的斗争贡献之大，将是不可估量的。
倘你将这一想法转达给你们国外的委员会和我们的海外侨胞，我将极为感谢。在此，特别要向在菲律宾的我国侨胞和在那里的工业合作促进委员会表示感谢，因为他们在支持我们的祖国和工合运动尽了很大的力量。
总之，倘若我们艰苦奋斗，倘若中国与我国国际朋友共同合作，毫无疑问，我们是能够打败日本，取得最后胜利的！
致以
民族抗日的敬礼

毛泽东于延安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日写于延安

毛泽东主席致何明华的感谢信(中文版)

尽管当时边区的工业还很少，但毛泽东认为，它的数目虽小，意义却非常远大，是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他在给博古的一封信中写道：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而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是机器而不是手工，“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任务。”(《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38、239页)为此，1940年(2月2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

二届工农业展览会闭幕式上致词中对工合运动的重要性再次作了充分肯定并号召大力发展之。他指出：“从现在起，我们在合作运动中首先应着重工业单位，他们有许多重要的任务，但是最急切的一个是要使边区每个县市，都创办一个工业合作社”。希望更多的作家、文化工作者能参加到合作事业中，去学习和帮助他们。(毛泽东在1940年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工农业展览会闭幕式上致词，《中国合作经济报》，1986年1月1日)

1940年初，毛主席还从延安派刘鼎、陈康伯、黎雪、赵一峰等同志到宝鸡等地，推动西北“工合”工作的开展。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他们建议西北工合要坚持民主办社，并应在陕甘川交通要冲、秦岭环绕的双石铺发展一些较重要的基础工业。这些意见凝结着解放区经济建设经验，有利于加强西北工合的薄弱环节，受到了西北工合的重视并被采纳。

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大力支持下，再加上延安事务所的努力和边区政府的大力扶持，工合运动迅速在陕甘宁边区蓬勃发展起来，从1939年4月延安事务所开始工作，到1940年12月先后组成29社，股金135000元。(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三编)[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到1942年，“延安的工合机构成了全国最大的地区总会，拥有的工人相当于中国其他地区工合工人的总和。”(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斯诺文集》，第一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286页。)成为全国工合的一个典范。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第五章中“关于发展合作社”中用翔实的数字说明了边区工合运动的成绩：

“就生产合作社说，1939年起，经过政府

的提倡与中国工业合作社西北办事处的帮助，建立了10个生产合作社。继而有一些资本较大的消费合作社也兼营生产合作社业务。到1942年10月止，由10个生产合作社增至50个；从事生产的员工，由199人增至563人；股金由11130元增到2941600元；每月生产总值，由6万元增至230余万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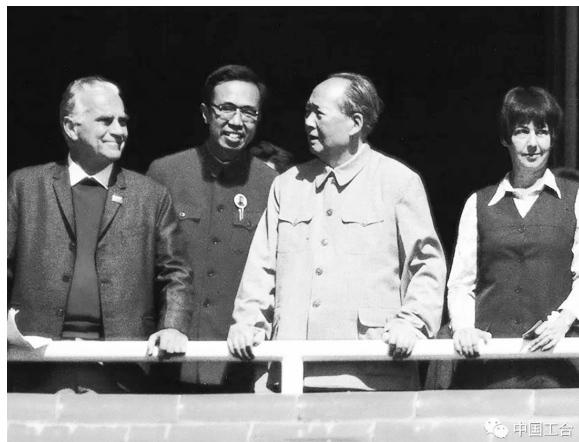
尽管延安工合资金严重短缺、设备非常简陋、技术相对落后，但对边区经济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促进了边区工农的发展，增强了边区抗战的物质力量，繁荣了边区农贸市场。抗战时期的延安工合运动为我党以后发展合作经济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解放后，1952年6月，毛泽东主席专门寄请柬来邀请艾黎参加国庆观礼，并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1960年毛泽东还专门设家宴款待中国工合两位主要创始人路易·艾黎与埃德加·斯诺，

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工合运动的历史作用。



1970年10月1日的国庆大典上，毛泽东主席特意邀请中国工合创始人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切交谈。

“工合”在民族危亡中崛起，在国家艰危中创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奋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发挥积极作用，虽历经艰辛，却硕果累累。作为由无数国际友人、革命先辈精心呵护并为之奋斗的进步事业，在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80余年中，中国“工合”发挥了其应有的、不平凡的作用，赢得了党和国家历届领导同志的赞扬和肯定。

（本文来源自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声光视讯专业委员会官网2021.1.8）

中国工合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中的1938年，是由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夫妇以及众多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发起，由宋庆龄同志做担保人，在周恩来同志亲自指导下成立的。国共两党的高层领导对中国工合的发展极为关注并参与了中国工合的领导工作。中国工合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

的成功典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晶。历史上中国工合通过组织工业生产，支援军需和民用，多方争取国际援助，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宋庆龄、习仲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誉。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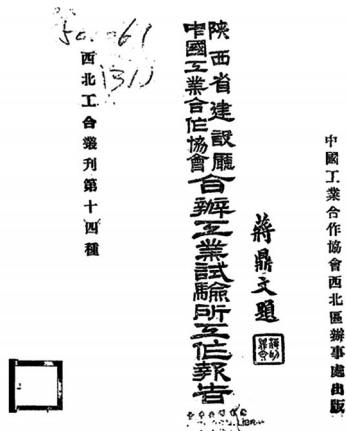
抗战时期工合运动中的陕西省工业试验所

郭巨权 邓宏锁

陕西省地质矿产实验研究所有限公司，原名陕西省地质矿产实验研究所，为我国较早为地质找矿服务的专业实验室之一；前身为民国时期陕西省工业试验所。

陕西省工业试验所始于1935年开始筹办的陕西省临时化验所，1936年7月正式成立陕西省化验所，1937年7月1日改名为陕西省工业试验所。该所原址是一座新建西式楼房，为独立的设施完善的实验楼，配备了先进的仪器设备及高素质技术人员，是当时陕西省唯一从事矿产、农产化验及工商产品检定及调查研究的官办机构。

1939年3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合办与原陕西省建设厅陕西省工业试验所，更名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陕西省建设厅合办工业试验所，为躲避日机轰炸，工业试验所由西安迁往凤县双石铺。参加“工合”运动，为中国抗战事业和工合运动做出贡献。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是1937年11月，由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和路易·艾黎为支援中国抗战而在上海发起组织的工业合作社运动。1938年4月，两位国际友人又与中国的爱国人士胡愈之、梁士纯、卢广绵、沙千里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工业合作促进委员会。1938年8月5日，“工合”在武汉正式成立，国共两党参与组建和领导，国民党行政院长孔祥熙任理事长，宋美龄任名誉理事长，共产党人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

等参加了理事会。路易·艾黎被任命为行政院技术顾问,并代理协会总干事,负责组织“工合”运动。在香港成立的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则由宋庆龄出任名誉理事长。中国共产党一直热情支持工合运动,毛泽东曾在延安三次接见艾黎。1938年8月,在宝鸡成立了第一个地区办事机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办事处”(简称“西北工合”),卢广绵任办事处主任,总会顾问路易·艾黎和工程师吴去非协助卢广绵主任工作。“工合”西北区办事处发展迅速,短短半年就建立了西安、兰州、宝鸡、天水、南郑、凤翔、双石铺等事务所,一百五十余个合作社。从事矿产开采、酒精生产、皮革加工、油墨印刷、军毯、军服生产及各种手工业生产。为供应战时的军需民用、支持长期抗战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由于当时西北经济技术落后,“苦无工业研究机构,供应其所需要”。1939年3月经陕西省主席蒋鼎文、前建设厅厅长雷宝华与“西北工合”卢广绵主任相商,陕西省工业试验所由陕西省建设厅与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合办。全面抗战时期,西安被称为“前方的后方,后方的前方”,是抗日救亡运动最活跃的地方之一,也是侵华日寇罪恶空袭的重要目标。陕西面临日寇威胁,工业试验所作为西北独一无二之学术研究机构,为躲避日机轰炸,由西安迁往凤县双石铺办公。

凤县双石铺,抗战前是个人口不足两

千的小镇。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它是陕、甘、川的交通中枢,战略地位十分突出,成为了西北的交通重镇,当时经济部、财政部、军需部等军政机关及省区县等单位纷纷在这里设立了派出机构。同时因凤县地处秦岭腹地,煤、铁等矿藏资源丰富。为了开发这里资源,开展后方生产,支持长期抗战,1938年9月,工合西北区办事处派人在双石铺组建了钨铁社、机器社、造纸社和耐火砖社等。10月,又在此设立了一个采矿办事处,专门负责与各采矿工业合作社的联络。1939年,路易·艾黎的一次延安之行后,根据共产党人的建议,为把双石铺建成人民游击部队的工业基地,他决定将自己的住所放在双石铺。在此后5年多时间里,艾黎长期在双石铺工作和生活,创立了培黎工艺学校,将相当多的精力放在双石铺工合事业上。

一篇发表于1939年9月1日的《工合运动在双石铺》的文中写道:“‘双石铺’这三个字,在过去似乎听到的很少,但到现在却变成震人耳鼓的地方了。它不仅在交通上占着重要的地位——西至天水,南到汉中,北到宝鸡……而且在经济国防上有绝大的意义。它北临丰禾山,西接嘉陵江,秦岭山脉环绕四周,森林、煤、铁等矿产更为丰富,横跨嘉陵江者为‘科阳桥’,建筑富丽,长约百米。每至夕阳西下,总必人满其上。沿着江边多为工业合作社的社址,其中以化学工业试验所之水塔,机器社、耐火砖社之烟囱为

最有特色。顺江两岸,水磨林立,大有江南风光,故留恋其江者,虽至夜晚亦不忍返。”文中记录“洋气十足的化验所—化学工业试验所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陕西省建设厅合办的,所内设备相对完善,化学仪器极多,大多购自德国。化学药品,参考书籍,也极丰富。惜房舍有限,尚有二十多箱藏在窑洞,室内陈设皆洋机洋器,洋画洋片,简直洋气十足。”

合办的工业试验所不但开展矿产、农产样品分析及工商产品鉴定,样品来自陕、甘、宁、川的工合企业及其他工矿企业,还积极研究利用地产原料生产和改良军需、生活日用品工业。如与“宝鸡工合”合作开办“工业试验所制造厂”生产火碱(烧碱)、肥皂、漂白粉、酸类;开展用地产原料生产单宁、染料试验,羊毛精洗试验,燃料酒精的精制,桐油制试代汽油,用植物油生产润滑油,甘油的提取,制药原料硫酸锌、硫酸铜和硝酸银试制;煤、木材的干馏,不同原料造纸工艺试验,印刷油墨、书写墨水的试制,蔗糖的精制,试制味精、酱油等。这些研究工作来自生产的急需,研究成果“指导各合作社实行,而大量制造”。

同时,工业试验所为工业合作社和其他各行各业做过多种有实际意义的检测试验。如为河南民生煤矿各地送来的煤样做鉴定,证明其煤质挥发物过高,属烟煤,但煤质坚硬,可用水洗剂后供炼焦炭之用;为褐铁矿矿石做试验,证明其灼热损失不大,氧化铁和纯铁含量均很高,资质也佳,可用来

冶铁等等。1940年终合办工业试验所出版《工作总报告》一册,主要工作包括:陕西省煤、铁、铅、锰、盐等矿产品及农产物之化验与工商出品之检验,计300余种;工业品之试制及研究10余种;此外开展调查工作5次,技术讲课工作数十次;承担双石铺“培黎工艺学校”学生的化学实习等。1943年合办期满,工业试验所回归陕西省建设厅,迁回西安。



凤县工合纪念馆的合办工业试验所场景

在双石铺的合办工业试验所,“发挥了科学技术中枢作用”,为西北工合运动及整个西北大后方工业经济发展,作了有重要技术价值和工业价值的检测、试验与发明创造。特别是其据抗战时期工业经济条件,顺应时势的需要,以地产资源和实用技术改良措施,服务于工合西北区中小工业发展群体,从而促进了西北社会农业、手工业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正如工合运动领导人卢广绵评价工业试验所“对西北工业之发展,当有伟大之贡献”,为中国的抗战和工合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本文来源自陕西省地质矿产实验研究所有限公司网站)

乔治·何克在华七年的足迹

况 鹰



学生时代的乔治·何克

1938-1939年,何克以记者身份赴上海、南京、武汉、北京及山西、河北等省对中日交战地区进行采访,对日军在华暴行向英美媒体作了大量报道和揭露。

1938年初夏的一天,艾黎在汉口一家餐馆里碰到了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史沫特莱把艾黎拽到自己的住处,说是要介绍两个不错的年轻人给他认识,其中之一便是刚到中国不久的乔治·何克。在艾黎的印象里,当时的何克显得那样年轻幼稚,艾黎不敢确信他能否在一片混乱的中国待下来。但艾黎也感觉到,这个帅气而健壮的小伙子身上有一种坚韧和刚毅。所以,艾黎告诉他,自己正在搞工合运动,工合组织的西北总部设在陕西宝鸡,如愿参与,可以到宝鸡去找“工合”主任报到。过后,艾黎就把这码事儿忘到了脑后。

在何克决定跟着艾黎干“工合”之前,他曾经去过延安,虽然仅有一周的光景,但对延

安精神感受颇深。“在那里卖茶人不肯收我的茶钱,他们叫我朋友。不多久我就升入‘同志’一级了。延安的学生人数和牛津一般多,有四千男生,一千女生,分属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延安艺术学院。除本部学校外在整个地区还有分校,在分校学习的还有好几千人,我现在处在红色中国的心脏里,它现在红得不厉害,但无疑是这一抗日运动在全国最强有力的中心。”在延安他看到各个阶级的大批青年从全国各地涌来,“从新加坡、马尼拉、新西兰和夏威夷被吸引到这里是很令人惊讶的”。何克所到之处,看到人们虽然生活艰难,缺衣少食,但无一不投入抗战,这种精神使他肃然起敬,他对共产党开始钦佩起来。之后何克见到了红军聂荣臻,聂将军要何克参观整个地区,给他派了一个陪伴,四名警卫员……在另一个村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这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友好地接待了他。



抗日根据地
何克与聂荣臻在晋察冀

1940年冬天,当艾黎从四川回到宝鸡时,在西北“工合”办事处的院子里,却意外地见到一个穿着普通蓝棉袄的高个子英国青年。高个子英国青年冲艾黎一乐,说:“我来了。”艾黎这才记起,此人正是何克。何克是在结束了对晋察冀边区的采访之后,决定前来参加工合组织的。他随即被“工合”办事处任命为巡视员,并负责“工合”的对外报道。这份工作需要他在宝鸡乃至西北地区到处跑,撰写关于“工合”发展状况和问题的报告。比起单纯写新闻报道,何克觉得这是一份更有实际意义的工作,所以尽管没有一分钱报酬,他还是欣然接受了。他把一枚“工合”徽章每天别在胸前,还给自己买了一条领带、一个茶壶、一条床单和一架相机作为庆祝。这几乎花光了他所有的钱。

随后的日子里,因为工作,何克去了很多地方。他有一床薄薄的靛青被面的被子,可以用一块油布包裹好随身携带,衣柜里也只有一件浅蓝色工装、两套短衫裤、两件衬衣、两件汗衫、一件毛衣和一套棉衣。带着简单的行装,他在陕西、甘肃、山西、河南等地奔波,日子过得忙碌而充实。

不出差的时候,他会被拽去参加“工合”社员们的晚会。晚会上做游戏,被游戏“抓”出来的人得出节目,“挨罚”的总是何克,他也总是乐于“挨罚”。现在,他已经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了,还交了不少中国朋友,其中有一位眼睛大大的、笑起来很好看的姑娘:小任。

那时从武汉逃出来的难民纷纷涌到陇海铁路的终点——宝鸡。工合很快收留了难民们,并将他们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生产自救,有的做鞋,有的缝衣,有的在铁工厂制造简单的武器弹药和零件,还有的纺羊毛、织军毯,支援前线作战。这些有益的工作,对克服日本鬼子的破坏和国民党的封锁、坚持抗战,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工合妇女工作部还开办了许

多学校,解决了难民孩子们上学的问题。这期间,何克拍下了很多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八路军抗战、以及日本鬼子残暴罪行的照片,寄到外国进行宣传,并从国外募捐了大量钱和药品,支援前方将士,给抗日战争带来很大帮助。

1942年3月,何克接受路易·艾黎的聘请,担任陕西凤县双石铺培黎工艺学校校长。他是培黎工艺学校第一任真正的校长。他杰出的才能和辛勤的工作,很快使双石铺培黎学校的面貌焕然一新。

“四个孤儿”的再生父亲。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何克是一个未婚的英国青年,但是却在中国当上了“四个孤儿”的养父。一个地下党员,因为暴露了身份,组织上调他去东北前线工作,家里留下了四个孩子和生病的妻子。临走的时候,通过朋友,把照顾孩子和妻子托福给了何克。那时何克在学校工作很忙,他把十来岁的老大、老二送到培黎学校读书,要把他俩和学校里一百多个学生都培养成既学知识又能制造武器、纺纱织布的劳动者。最困难的是两个只有3岁和不到2岁的幼小孩子,吃喝拉撒睡都要管起来。不久,孩子们的母亲病故了,何克就承担起四个孩子学习和生活的全部责任。何克在中国孩子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对他们百般疼爱,成了孩子们真正的“父亲”。战时长期超负荷工作又加上缺乏营养,已使何克心力交瘁。孩子们逐渐长大成人但何克却越来越瘦了。

后来培养孩子的重担又由艾黎继续挑了起来。现在这四个孩子都长大成人,其中三人在北京和东北的研究院工作,一个在外支援兄弟国家。他们都已成为建设祖国的栋梁。如今,每提起往事他们都唏嘘不已,永远不会忘记何克对兄弟四人的养育之恩。

1944年冬,何克带着60多个孩子和沉重的设备,经过1100多公里的征途,将培黎学校

全部迁移到甘肃山丹。在山丹培黎学校办学中,何克提倡“手脑并用”、重视理论联系实际,认为学生的劳动观点和文化理论学习同等重要。学校不久有了毛纺厂、棉织厂、机械厂、电器组、汽车运输组、陶瓷组、化工组、造纸组、印刷组、玻璃组、采煤组、实验农场。何克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把自己的一生能和这些孩子联系在一起是很有意义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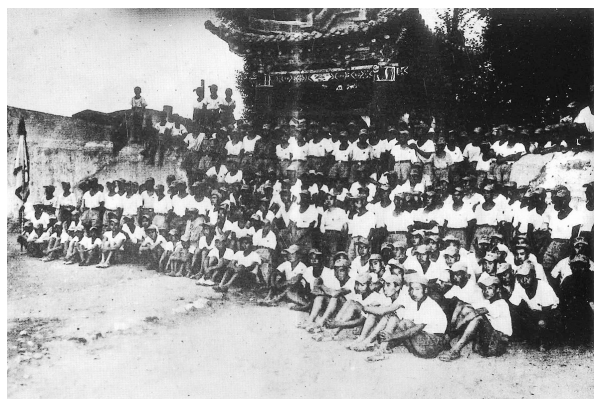
艾黎与聂氏四兄弟合影(自左至右为聂广沛、聂广淳、聂广涛、聂广涵)

1945年,乔治·何克在抗战中写成的《我看到了新中国》一书在美国和英国出版,他以激扬的文字记录了抗战见闻,系统全面的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人民的全民抗战。

乔治·何克在华的病危:乔治·何克在华曾两次病危。1939年在河北安国县患伤寒病一月。1941年在陕西汉中患炭疽病一月。

乔治·何克在华去世。1945年夏,何克在打篮球时脚趾受伤,染上了破伤风,7月22日,年仅30岁的何克停止了呼吸。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何克让艾黎拿来纸笔,写下了“把我的一切献给培黎学校”的遗言。他的一切,从物质财富的角度上讲,不过是打字机一台,照相

机一部,手表一块。但是,他留给培黎学校的精神财富,远远不止这些。何克去世不到一个月,日本投降。何克与中国人民一起度过了8年艰苦卓绝的时光,却没能亲眼看见胜利的一天。孩子们把书写有他们自己姓名的校旗放入棺木,乔治·何克的这“大家子人”围着坟墓唱起了校歌,行三鞠躬礼与他告别。艾黎和同学把何克埋在了南门外的一小块空地旁,希望何克每天能听到他们的欢声笑语。他们把这一天定为了一个节日,每到祭日,学生们便带着好吃的饭菜坐在何克的墓前给他唱歌。这样的纪念日活动一直到1953年艾黎定居北京。



何克校长逝世三周年,全体师生在山丹南门外何克纪念亭前合影

根据艾黎的遗愿,艾黎骨灰安放在何克陵园。何克陵园并改为“艾黎与何克陵园”。1988年4月,邓小平为“艾黎与何克陵园”题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艾黎与何克陵园已成为享誉国内外的人文景点和甘肃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作者况鹰系路易·艾黎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我们的艾老

刘庚寅

路易·艾黎同志去世了。人到老年，一般不容易动感情，但每念及他，点点相思泪总是忍不住夺眶而出。

他去得如此匆匆。12月2日，大家刚高高兴兴地庆祝了他的90大寿。国务院总理向他祝寿时转达了邓小平同志祝他活到21世纪的愿望，习仲勋同志也祝愿他活到150岁，但时隔不到一个月，他还是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有人称他是“老战士、老朋友、老同志”，有人称他是“著名社会活动家”，也有人称赞他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但是接近他的人们总愿亲昵地称他一声“艾老”。

他出生在新西兰的一个小康之家。1927年他来到上海，看到旧中国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不忍离去了，决心抛弃舒适的生活，为中国人民做些有益的事情。他认准目标，头也不回地一干就是60年，直到心脏停止跳动。在这天翻地覆的60年中，他为了让中国人民得到幸福，自己却尝尽了千辛万苦，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汗水。

他为了专心致志地为中国人民做点好事，不愿有家室之累，因此终生未婚，却收养了不少我党地下工作者的孩子和贫苦农民的子弟。他既当严师，又当慈父，不仅教他们文化知识，还要照顾他们的生活。我每次看到他当年在山丹头顶皮帽，身穿棉袄，足踏毡靴，怀抱两个他抚养的小孩拍的照片时，总是

激动不已，真想向他献上一首“让世界充满爱”之歌。

我初次见他是在1952年6月，他应邀从甘肃来京参加亚洲与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我对他慕名已久，想像中的他是位风度翩翩的西方学者，但一见面却大出意料，他身材粗壮，头剪短发，穿一身褪了颜色的布衣，一双久经劳动磨练的大手，握手之力令人有点吃不消。如果不是他那高鼻子、蓝眼珠，很容易让人误认他是一位土生土长的陕北老农。



师生们在四坝滩的学校农场挖灌溉渠

和他长期接触中，使我感到他既平凡，又伟大，或者说是寓伟大于平凡之中。他经常谈起40年代初期在山丹创办培黎学校的情景，对他曾开荒和居住过的四坝滩更是怀念不已。1986年我趁参加新建的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开学典礼之机，去了一趟四坝滩。那是块什么地方啊！它远离县城，一片荒凉的

沙滩,既无村落,也无人烟,只有一个孤零零的小山包。涓涓流水绕山而过,据说是当年艾老率领学生们挖的水渠。山顶上有些断垣残壁,是艾老曾居住过的地方。艾老在这个小山包上看到了中国的黎明,看到了中国的未来。我在山顶捡了一块陶瓷片,带回来给艾老看,他风趣地说:说不定这就是我当年吃饭的碗呢!

从50年代艾老迁居北京后,他仍经常到各地巡视,发现问题立即向有关部门反映。他最关心的是长江上游水土流失问题,曾不止一次地建议要多栽草种树,严禁乱砍乱伐。他也许知道他的意见不一定被采纳,但他仍毫不气馁地写信给有关部门。直到近年来,长江上游江水不断泛滥成灾,人们才又想起他的预言和忠告。

艾老既富有,又清贫。说他富有,是因为依靠他的影响和号召,外国对培黎学校的捐款和捐赠物资源源而来;说他清贫,是由于他生活简朴无华。苏菲同志(马海德大夫的爱人)为他织的毛衣,直穿得边破线断,他也不肯买件新的。一位朋友为他做了件棉背心,他竟一年四季都穿着,尽管污迹斑斑,棉絮绽露,也不肯扔掉。不少朋友常想给他买些他喜欢吃的食品或送他一件心爱的礼物,他总是说:还不如省下这些钱,捐给培黎学校呢。1986年夏季有位美国朋友到北京看望他,临别时对他讲,到外地参观访问后还要回到北京,再会他一面。他竟说:我劝你别回来了,把省下的路费捐给培黎学校吧!这位朋友只好无可奈何地照他的话做了。

他是一位非常平易近人的老人,他还是一部活的中国近代史辞典,因此经常宾客盈门,但有时又有些“倔”脾气,甚至倔得让人下不了台。“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的喽罗要求他写批邓文章,被他义正词严地拒绝了。他的两位熟人想通过他的关系到新西兰去留学,他毫不客气地对他们说:你们别想利用中国领导人

对我的信任和尊重,要我做不应该做的事。1980年他病在重庆,医生向北京告急,邓小平同志得知后非常关心,立即指示对外友协派人接他回京。当时我带着对外友协前会长王炳南同志的信,怀着既兴奋又忧虑的心情赶到重庆,但想不到一见面他却严肃地对我说:你们不应该为我的事打扰邓小平同志,他日理万机,你们要珍惜他的时间,让他处理国家大事。我这点病算什么,你回去就说我很好,不需要回北京。这次重庆之行,竟使我自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未能完成组织上交付的任务。

艾老终于离开我们了。他在遗嘱中还谆谆告诫:后事一切从简,“对于人民费时花钱的做法应当破除”。“这不过是又一名战士在行进中过去了”。骨灰“待有便人或朋友去山丹时顺便带去,撒在四坝滩的原野上”。对他的崇高品质和无私贡献,我这里愿引用宋庆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为艾黎写的一封证明信中的最后一句话,作为对他的评语:“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

(作者刘庚寅(1926—2019),系全国友协原副会长、路易·艾黎研究中心特邀顾问,本文选自陈发兴主编《永久的怀念》(1992.9))



艾黎与来访的新西兰客人行亲鼻礼(右一为对外友协副会长刘庚寅)

路易·艾黎 支援抗美援朝的见证



此文物是一份山丹培黎学校代收艾黎捐献抗美援朝现金的收据凭证。收据长16.5cm,宽9.5cm,上写艾黎捐款2838960元(为旧币,折合今币约283.9元),两侧印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字样,为学校自制。二级文物,现收藏于山丹艾黎纪念馆。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10月初,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在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同时,党和政府在国内发动了一

场声势浩大的支援抗美援朝运动。山丹军民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全力以赴支援抗美援朝战争。

1951年1月,山丹县抽调140名干部组成报告团,分赴全县开展宣传宣讲。机关、学校、工厂、部队、乡村纷纷召开座谈会动员群众积极参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斗争。培黎学校学生组织了流动宣传队与全县人民一起声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的正义行动。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各族各界人民发出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优待烈军属的三大号召,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响应,纷纷捐钱捐物,为抗美援朝尽心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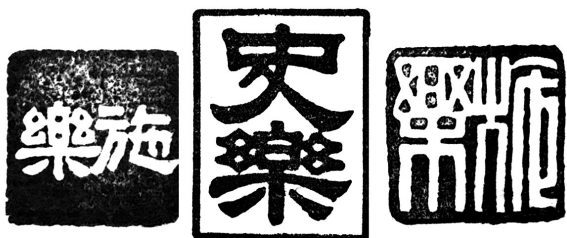
艾黎《旅华廿五年》中记载:“6月14日晚上,培校的学习小组专门讨论了怎样援助在朝鲜的志愿军”。在《山丹一年来的抗美援朝工作》的档案中,记有“培校教职员学生工人共捐款4500多万元(折合今币4500多元)”。捐款人除艾黎外,还有当时在校的外籍教师,这些捐款有力支援了全国的抗美援朝运动。平凡的举动展现的是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不仅有力支援了志愿军,也极大地鼓舞了山丹群众的革命斗志和劳动热情,这种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精神,将助力新时代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须永续传承、世代发扬。

(本文来源自肃北文化旅游网站2021.10.20)

斯诺的三枚印章

刘力群

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先生一生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民。他不仅爱中国的锦绣山河,也爱中国的悠久历史和璀璨文化,这从目前所发现的三枚斯诺汉字印章可见一斑。



斯诺于一九二八年首次来到中国,一九三二年底与海伦·斯诺结婚后从上海移居北平,一面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一面跟随一位中国老先生学习中文,并且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施樂”。(斯诺:《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p144)

对于斯诺这段在北平学习中文的经历,曾经当面采访过海伦·斯诺并与海伦有过许多书信往来的人民日报老记者白夜这样写到:“一九三三年,斯诺来到燕京大学,一边任教,一边做记者。他努力学习中文,会说适度流利的口语,在一个国家里采访,不懂这个国家的语言怎么行呢?他甚至在生活中也模仿中国人。一天,他到前门大街亿昌图章店,请

人刻了一枚隶体汉文图章。‘施樂’二字,赫赫朱红,也够古色古香的了。”(白夜:做斯诺式的记者,《新闻战线》,1979年1期)



目前,这枚铜质“施樂”印章由国家博物馆(原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是海伦·斯诺一九七二年首次访问新中国时赠送给我国的。(海伦·斯诺:《重返中国》,中国发展出版社,p9;《文物:革命文物特刊》,1974年1期)同时,她还赠送了斯诺保存的用苏维埃铜币制作的手串。这些苏维埃铜币,是斯诺一九三六年夏访问陕甘宁边区时,经历过长征的红军战士赠送给他的。



斯诺的第二枚汉字印章,由斯诺后来的夫人洛伊斯·斯诺赠送给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现陈列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堪萨斯校区图书馆的斯诺阅览室里。这枚牙骨汉字印章用了“史樂”两个字,也是隶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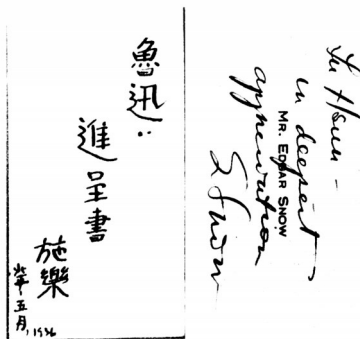


陈列在密苏里大学堪萨斯校区斯诺图书馆的“史樂”印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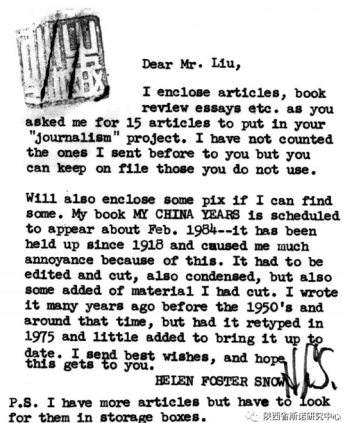
相对于“史樂”,斯诺更喜欢用“施樂”来做为自己的汉字姓名,这可以从他多次用“施樂”二字签名看出来。根据我的收集,目前找到有四处“施樂”签名,其中有一九三六年五月斯诺在给鲁迅一张名片上的签名;一九四二年他在赠给浦爱德(Ida Pruitt,“美国援助中国工合委员会”中国代表)《为亚洲而战》(The Battle for Asia,又译《争夺亚洲之战》)一书上的签名;以及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写给路易·艾黎信上的签名。

斯诺的第三枚汉字印章,是海伦·斯诺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四日写给我的一张便条上钤印的,这一枚印章,用的是“施樂”二字的篆字。目前,这枚印章还不知在何处,也有可能保存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的杨百翰大学海

伦·斯诺资料收藏中心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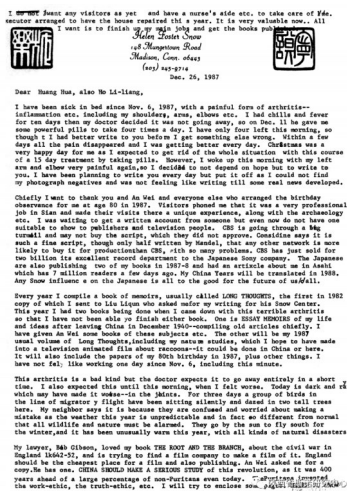


斯诺1936年5月给鲁迅的名片:
进呈鲁迅,致以最深切的敬意! 施樂(签名)
北平, 1936年5月 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



1982年11月4日海伦写给刘力群的便条

值得一提的是,海伦·斯诺将这一枚“施樂”篆体阴文印章,与自己汉字姓名“寧謨”(尼姆 Nym 的谐音)篆体阳文印章,同时用在自己特制信笺的抬头上,这一方面说明了海伦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喜爱,也说明了她对埃德加·斯诺的怀念之情,把她与斯诺的关系,既看作是曾经的夫妻,也看作是并肩工作的搭档。



1987年12月26日,海伦写给黄华、何理良的信,信中提到安危、康西丁、曼代尔、刘力群等

印章虽小,但它们承载着的文化和历史价值却是巨大的。希望通过这几枚斯诺和海伦的汉字印章,能让我们更进一步感受到那渐行渐远的历史,更加触摸到斯诺与海伦

这对中国人民忠实朋友的中国情结和人生脉络。

今年是埃德加·斯诺先生逝世五十周年,谨以此文寄托对斯诺先生的怀念和崇敬之情。

(本文来源自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官方微信2022.03.31)

作者简介:刘力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1978届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曾参与创立“中国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三S)研究会”,任副秘书长、秘书长;现为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常务理事、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高级顾问。多年来致力于收集、研究和宣传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海伦·斯诺、索尔兹伯里等国际友人的著作、签名本等珍贵文献。2020年他将半生收藏的珍本、善本无偿捐赠给国家图书馆,其中国际友人珍贵签名本、书信手稿及相关资料共计30种44册件。

在山丹,我们请人在一块古石的背面镌刻了“创造、分析”四个中国字作为校训。因为我们学校一直想做的工作就是教育青少年不仅要获得书本知识,而且还要具有生产的实践经验,使他们自己能分析和创造。中国古代的一部经典著作《礼记》上有一段说:“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

这些话流传至今已有2000多年。许多教师对这些话进行了研究。许多

人遵循着去做,成了教育家。现代的复杂生活使这些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我们在山丹的办学经验表明,12岁到20岁之间的青少年可以边生产边学习,而且只要教育方法得当,他们所学到的一般教育科目的内容甚至会比在全日制学校中所能学到的更多。因此,最重要的是让这些青少年有创造性的工作可做,并参加做这种工作的斗争。

——摘录自《艾黎自传》:“创造与分析”——新型教育的箴言